S. 50
30
12.246

反對陳獨秀和機會主義

(文章的蒐集和其材料)

ПРОТИВ ЧЕН ДУ-СЮ и ОППОРТУНИЗМ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ссыл. карточка на
Цюй, Цю-Бо (Страх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УТК.
Москва 1930г.

[На китайск. яз.]

266
1930

252791 Y

Дюй Дю-Бо.

S. 80
30
12.246

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

Китайское ликвидаторство и оппортунизм.

中国革命的失敗和国民党表面上的„統一"中国，使中国共産党裡的機會主义者，重新暴露更加厲害的動揺和猶豫，„傳達資産階級的影响到無産階級身上来，而阻滞無産階級的階級鬥爭。"機會主义者之中，有些簡直進到公開的取消主义。反对這種取消主义的鬥爭，尤其是反对外交式的暗藏的機會主义的鬥爭，是現在中国共産党内非常主要的任務。現在，中国的反革命已経成爲国際帝国主义進攻蘇联的直接工具（中東路事変）；中国反革命營壘之中，重新爆発延綿的軍閥混戰；中国資産階級的民族改良主义，改組派等類的政客，企圖推延革命的爆発，阻滞革命的爆発，宣布他們的„参加軍閥混戰是爲着民族民權主义而鬥爭……以救済地主資産階級的反革命於滅亡；"而中国工人運動的高潮，却在継續開展的農民戰爭的背景上，日益生長起来；——総之，現在正是中国共産党„應當開始準備群衆，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産階級联盟的政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積極的開展并且日益擴大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群衆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運動，游擊戰爭等々）。"正在現在這種時候，機會主义者的領袖陳獨秀却公開的宣布他的政治主張，攻擊中国共産党的総路線，完全走到取消主义的地步；中国的脫洛茨基派也積極活動起来，陰謀破坏中国共産党；他們的雙方並進和联合行動，都是在國加強党内機會主义者的立場，以阻滞共産国際和中国共産党的総路線的進行，幫助資産階級来擾乱破坏無産階級的革命隊伍和革命鬥爭。如果不打碎右傾的和脫洛茨基的取消派，如果不克服調和主义，

那麼，就沒有可能執行国際共產加 中国共產党的任務改，沒有可能反对戰爭的危險，擁護蘇联，反对国民党的組織，沒有可能準備工人階級和勞動群衆去实行革命的鬥爭，去鍛鍊出工人階級的真正革命領神 —— 真正能够勇敢的絶不動搖的引導無產階級，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統治，而实現蘇維埃的中国的領神。

一.

陳獨秀的政治主張，是今年七月底発表出来的，他寫給中国共產党中央委員會三封信，同時送到地方党部，（安徽省委員會已經受他的影响而有反对中央的决議），並且还発現在中国脫洛茨基派的機関報上。他的政見，開始是說，擁護蘇联"的口号不適宜於中国的群衆程度，應當改做，反对国民党誤国政策"的口号。可是，隨後，他自己公開的說出来：他認為党的總路線，完全是錯誤的。事实上，他的三封信裡面，的確完全発表整個的取消主义的路線，絶对和党的路線相反的路線。

註：— 関于中央答覆中已經詳細駁斥的幾点，此地不再詳說。

* * * * * *

他的取消主义總路線，分做三個主要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国革命失敗後的政權性質問題。

他說：„中国共產党过去機會主义政策発生的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発展对於革命之作用和其危險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階級性之差誤的観察以致不自覚的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过份助長資產階級的軍事力量，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的前提。……當廣州暴動之前後，我覚得中央在政治上有差誤的估量遂致有差誤的政策，當時我就認為應當採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護階級的戰鬥力。就是我们從戰場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隊伍…… 然而党的中央 在大次大會

以前，始終不認識革命的失敗和資產階級的勝利。……使敵人得着機會用各個擊破的方法，在全国範圍内把我们階級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積極的份子亦因之丧失殆盡，党和群衆也断了联係，至今尚不易恢復。"陳獨秀的意思，是說中国革命失敗的責任，在共產国際和中央委員會身上：共產国際不應當幫助中国資產階級的勝利，而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委員會，以及共產国際執行委員會更不應當不採取"退守政策"。所以他認為——共產国際和中国党中央的政策的結果，就是無產階級的力量完全消滅，而純粹資產階級的国民党却得着了完全的勝利。陳獨秀自己，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間，向来堅决的反对"共產党人包辦国民党"，認為国民党應當由国民党員自己去領導，認為中国革命的領導權應當帰之於資產階級。現在，他彷彿"懺悔"起来了，說：一切機會主义都是沒有看清中国資產階級对於革命的危險，沒有看見"国民党向来就是純粹的資產階級政党，而决不能变成幾個革命階級联盟的政党"。這是真正的懺悔么？——不是的。這实在是他想辦護自己以前的反对"包辦"政策，辦護自己以前的機會主义策略——把中国革命和當時的国民党送給資產階級去領導的策略。直到現在，他还是認為，中国的一切都由資產階級来决定：資產階級得勝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都消滅了，——党的總路線，早就應當是"退守政策"。

反革命固然是暫時勝利了；但是，反革命的勝利，是"因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勢力暫時比革命的力量还要大些"這個反革命的勝利之中，中国資產階級當然有許多"很大的功績"；可是中国現在反革命的勝利，决不就等於資產階級的勝利。陳獨秀的見解，却好是相反。他說："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就被商業資產階級所推翻……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經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实質上已久不

存在。……中国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是一個極大的轉变　時期，這轉变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資產階級得到了優越地位，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讓步和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的比重封建剩餘。在這個極大的轉変之中，受了最後的打擊，丧失了統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權形式，丧失了和資產階級的对立的地位，在這個过程之中，已経成為殘餘勢力的殘餘；他為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的資本主义化，就是說，封建勢力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経済勢力，做他们在各個區域内的統治基礎。……他们所以現在尚能生存，乃因為中国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勢力的威嚇不但不願意消滅封建勢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勢力妥協来，形成自己為中心，為領導的統治者；并且已实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偉大的中国革命之中，獨秀只看見„資產階級的大变動”，他認為中国的資產階級已経完全取得政權，封建勢力已経只剩得殘餘的殘餘；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把資產階級放到了政權上去，他說：„從張學良到汪精衛，都是[資產]階級占有中心勢力的政權。”既然這樣，那麽，封建勢力在中国已経消滅，農民群衆反对封建地主的鬥爭，已経没有？——是的，他簡直公開的說：„中国向来没有封建的特權階級”。獨秀的這種观点，根本是否認中国的土地革命，——他根本是没有看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之中的大变動，正是農民群衆脫離資產階級的影响，而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起来反抗地主豪紳的特權階級的統治，形成偉大的革命力量，真正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統治的力量。照獨秀意見看来，資產階級的叛变，已経結束了這一革命，已経形成„新的”中国——資產階級的中国。所以他自然是誇大反革命的勝利，說帝国主义　給中国

資產階級多大的讓步，說中国資產階級已經有了最優越的政治立場，說中国国民党的政權已經完全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權。

不但如此，他更加進一步，解釋這種"新的資產階級的中国"形成的过程，說中国的軍閥混戰，彷彿是這種过程的表演。他說："中国資產階級还正在複雜的变化的过程中，和歐洲已經能够和平発展而且已經有高度発展的資產階級不同的，他們的階級来源太複雜，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縱他們内部各派之間的政權和地盤的明爭暗鬥，以致爆発戰爭，這是突然的現象，而且是較長期的現象，蔣桂的戰爭，不过是其中之一；這都是資產階級新政權的内部衝突，而是和国民党從前对北方封建軍閥戰爭有不同的性質。"這樣，現在国民党軍閥的混戰，都是中国資產階級複雜的発展过程。

獨秀的這種見解，很明顯的表示：他是認為中国資產階級的叛变，已經完全足够取消中国的革命。他只看見国民党將軍之間的混戰，認為可以表現"複雜的非和平的資產階級　的発展过程。"他却没有看見两年来中国对農民戰爭的発展，不看見無產階級領導着農民実行反对中国的革命軍閥混戰的鬥爭。照他的意思，資產階級幫助中国的革命，中国革命方才有階級的意义和社會的基礎。"（陳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与革命的資產階級"——譬導），這是獨秀在一九二四年的意見；他後来就認為："農民的原始暴動和游擊戰爭，只是反動的無政府的行動，太平天国前後中国早已有过這種騷擾，現在也还是這樣，這决不是什么革命力量"——這是獨秀在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之後的意見；現在他更認為国民党的軍閥混戰，竟是中国"資產階級発展的複雜而非和平的特殊过程"了！本来是不錯！現在革命已經"丧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資產階級已經能够組織"新的政權"，革命自然

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了；至於農民群衆的戰爭，以及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反抗運動，那是違背着資產階級進化的自然过程的，是没有什麼用處的。

固然，陳獨秀現在說：中国民權革命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所不能解決的，現在还是„工農的民權革命"。在這一問題上（在中国革命性質的問題上），他还没有抄襲脫洛茨基主义取消派的口号，他没有說；中国革命已經只會是社會主义革命。可是，他的結論，同樣是中国革命已經結束，現在是長期的反動時期。這是比脫洛茨基更公開的取消主义。因此，雖然他亦說：„要利用資產階級内部的每次衝突，擴大我们的運動，每次大小戰爭之中，不但要消極的反对，並且要積極的反对，以致於變這種戰爭，爲階級戰爭"；然而实際上，他和脫洛茨基派是同樣不着見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不着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戰爭的作用，所以他的所謂階級戰爭，只是冠冕堂皇的空話。

陳獨秀已經認爲：„現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貧農（雇農，小佃農，小自耕農）是革命的柱石，而中農是中間動搖份子，富農是反革命者"，據他說：„中国富農，完全都是鄉村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在鄉村中発展的初步形式，一樣他对於下層群衆的革命，步然和城市資產階級取一致的態度"。他的主要意思，並不在於他會指出中国富農的反革命性，而在於他認爲中国已經没有„兩種社會戰爭"，（解釋見後）而只有簡單的城鄉無產階級反对城鄉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完全否認国有農民反对封建地主的鬥爭。因此，他就認爲中農群衆，已經都是不革命的了。爲什麼？因爲他以爲資產階級已經勝利，不但得到了政權，並且得到了領導中農群衆的領導權；不但在国民党政權之中占着領袖地位，而且还會經过戰爭去発展資本主义，鄉村資本主义正在発達起来——所

以中農群衆已經不要革命。他的觀念，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取消農民戰爭的可能性。他表面上說„贊成”中国共產党的蘇維埃的口号；事实上，他是用他自己的這種解釋方法来„贊成”的。他說：如果„反動的封建階級还有這樣的强固基礎”因此，„一定要推論到階級联盟的老政策……那末，譚平山說共產党的政策是起時代的政策，亦許是对的了。”請看：他是這樣的„反对”譚平山呢！據他的意思，共產国際和中国共產党，一方面提出蘇維埃的口号，一方面承認封建殘餘还是統治着的力量，這是自相矛盾的。他以為：凡是封建階級統治着的地方，那麼，無產階級一定應當和資產階級合作妥協。這正是暴露他澈底的不可救藥的機會主义。他只看見資產階級的叛变和富農的反革命，就立刻認為中農群衆已經不會再革命了；他却不願意看見„農民的階級分化，警醒其中許多政治上瞳着的成份，並且使鄉村無產階級更加接近城市的無產階級，而„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对抗却在加强，生長劇烈起来。”所以他的總路線，根本是不要領導農民，根本是藉口„中農民動搖”，而表現蓋他不願意推動農民起来革命，掩蓋他的所謂„階級戰爭”是騙人的空話。

陳獨秀固然會利用中国党內政治觀衆上的錯誤，例如有些同志把蔣介石廣西派的戰爭，解釋成資產階級反对封建階級的戰爭，主張联合富農的政策等々，他利用這些錯誤来攻擊党的指導機關，而自己假裝着非常之清高的，非常之„純粹無產階級”的政治家。他說：„從張學良到汪精衛都是資產階級……此時不需要代他們去分那個是純粹資產階級的，那個是封建性質的，或者那個比較進步些較左些，那個反動些那個还有改良主义政策的企圖或欺騙那個連這些都沒有。這决不是我們的任務”。據他的意思，如果指出汪精衛陳公博等重新„企圖

形成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中間”那末，就一定應當採取和汪陳派联合的政策。所以，他是„反对”„联合”的，他是反对分別誰有改良主义誰沒有改良主义的。他自己以為這算是„純粹無產階級的”政治家。其实，模糊含混的否認反革命联盟之內的階級分別和最近反革命營壘的政治上的分裂，因此，对於群衆不去指出汪陳派的特別危險；——這在客觀上正是幫助資產階級，使他更加容易迷惑群衆，這是忽視爭取群衆的任務引導到極有害的機會主义的消極，投降資產階級。

總之，对於中国革命失敗之後，政權的階級性質問題，陳獨秀的答案裡，包含着整个的取消主义的觀点，他对於現在的中国階級力量的相对関係，有一種絕对和中国共產党不相同的觀点。他的總意思是：封建階級已經是只有殘餘的殘餘，資產階級已經握得全部的政權，富農固然因為是資產階級裡的原始萌芽形式，已經是反革命的成份，就是中農也已經動而不革命了。無產階級呢？——因為共產国際及中国共產党中央的錯誤政策，幫助了資產階級勝利，所以無產階級的勢力已經全部消滅。革命是完結了，革命的前途是已經取消了！而資產階級的前途，却會經过„複雜的非和平的过程”經过戰爭而發展資本主义。這種取消主义的十足的理論，表面上似帶着些清高的空談，实際上完„全”是投降了資產階級。

（二）

第二個問題是革命新的高潮和策略的問題

陳獨秀对於革命高潮的觀点，很明顯的可以從他的根本的觀点裡推想出来。他的根本觀点，可以說是：㈠„国民政府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㈡„軍閥混戰和農業恐慌”不能成為革命的主要動力还會引起資本主义的發展”。㈢„中

国資本主义的統治已有相當的穩定，在最近將來會有一個長足的發展”。自然他的結論也同樣是：„現在不要高叫什么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来，現在是沒有什么革命高潮的象徵”。他自己的話也正是這樣說法：„現在決不能把時斷時續的工人経済鬥爭，認為是新的革命的高潮；現在只有工人部份的抗議，這是對対資本進攻的自衛性質的鬥爭，這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我们固然不宣傳革命低落；然而如果宣傳革命高潮的不可免，那就是使群衆認為自己鬥爭之外，另外有一個什么革命高潮，會從天上掉下来。高潮現在是不會到来的，因為沒有充分的群衆鬥爭。現在是兩革命高潮之間的情形。中国共産党不專門誇大革命高潮的象徵，以致於帮助一般同志走上盲動主义的道路”。

陳獨秀完全否認革命高潮的生長，他就嚴厲的攻擊中国共産党中央，說中央的政策是一貫的盲動主义的総路線。他說一九二九年上海五卅紀念的示威，是盲動主义的指導；他說中央為着反対国民党掠奪中東路，而指出世界革命最近的高潮也是盲動主义；他說中国共産党的盲動政策，使上海的郵政工會，恒豐及老怡和紗廠工會的工作和組織，完全被坏，（這些工會裡因為共産党員的積極，国民把這些工會的組織解散而改組，黃色工會的領袖重新被指派来組織工會——陳獨秀就是說共産党盲動的結果）。陳獨秀自己的策略是怎樣的呢？當然也應當說：„不可以幻想把每種鬥爭都変成政治鬥爭，以致於嚇退群衆”。他自己的話是：(一)„示威運動是一个嚴重問題，現在党的中央命令幾个群衆去强迫群衆示威，来證明(!)革命高潮的到来——這是盲動主义”。(二)„應當実行可能的政策，切合於群衆的要求，而不能有誇大的作量”。(三)„一般的合法運動，固然是抛棄革命的企圖，然而在一定條件之下，有為着発展我们力量的步

要時，不能拋棄一切合法運動"。

陳獨秀的這種可能主义和合法，完全暴露他的假清高的"純粹無產階級"政策的假面具。他对中東路問題的主張，就是根據於這種可能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他曾經假清高的批評"联合農民"的口号；批評分別汪陳派是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义的派别。但是，他所要联合的是誰呢？他要求党降低自己的口号，去適應所謂"廣大的落後的無產階級之外的群众"。這所謂的"群众"是誰呢？他說："中国的群众都还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成見之中；廣大的群众还不知道蘇联是中国的朋友；所以"擁護蘇联"的口号，只能引起最覺悟的無產者，而不能引無產階級之外的廣大的落後的群众……只有"反对国民党誤国政策"的口号，站在民族主义的观点上，方才能够引起群众的熱忱；而"擁護蘇联"却只是無產階級一階級的口号。他顯然仍旧是堅持着中国機會主义的傳統：以所謂民族和階級的对立起来。第一，"擁護蘇联"的口号，决不是他所謂"階級的"口号，中国廣大的工農群众了解而且深切的感覺這个口号是與中国的解放密相連接的，只有資產階級要利用民族主义来蒙蔽群众。八一以来的中国各地群众運動，明明白白的證明這一点。第二，他一方面咀咒着反動的無政府的盲動的農民戰争，一方面却說要联合"無產階級之外的民族主义的落後群众"。這实際上是联合民族改良主义的資產階級。中国共產党中央回答他，說他的立場是左派資產階級的立場，——這是十二萬分的正確。他是寧可拋棄土地革命的農民群众，而投降改良主义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資產階級。

總之，陳獨秀的取消主义的策略，就是認為革命早已完結，應當適應資產階級勝利後的新環境，拋棄日益分化的農民，反正已經沒有反对封建地主的鬥争，投降

5454

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可能的範圍之内，進行合法主义的運動，不要忘想革命高潮的到来，不要去獨立領導工人群衆的鬥爭，不要去实行轉变経济鬥爭到政治鬥爭，不要去組織群衆的政治示威，不要去領導農民戰爭。

第三个問題是党内統治問題

陳獨秀說：党有了這種盲動主义的総路線，自然要引起党内的同志的不滿意，於是党的中央便用"戴高帽子"的辦法，說某：同志是機會主义者，是非無產階級的意識……等，這樣破坏党内和平，引起了人紛紛，没有民權集中制却"变成了官僚主义集中制"，他說："我听見說布哈林同志有一次告訴特立同志：你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小孩子為什么你當初有了反对盲動主义的不同意見，你不說出来呢？"這句話是要表示中国党内這樣的没有民權主义，嚇得大家連話都不敢說了。他指出来說：有幾個同志在最近告訴他了；他们的確有对於中央政策及工作方法的不同意見，但是怕說話，因為"中央用警察式的手段(!) 对付同志，如果我们說一个字，我们就要失掉工作，或者派到有生命危險的地方去"。這種造謠中傷，攻擊党部的手段，本来是各国党内右派及一切反对派用的。陳獨秀這種宣傳煽動，簡直是要準備一个"取消派的党内暴動"！他口口聲聲說党强迫命令同志去盲動，去犧牲性命，不負責任的去欺騙群衆，欺騙党員。這真正是歷史上的重複表演：俄国當初的取消派，也是這種論調，譬如說："這些地底下的个人……無論对於誰都是不負責任的，却要命令群衆発動"（一九二三年初俄国取消派報紙"光線"第一百〇一号）。

陳獨秀因此要求党内現在要实行完全的民權主义，要求"從支部直到區委，如果可能还要直到省委，都完全要用選舉方法"；要求党員都要有"批評討論的自由"。他并且要求重新廣泛的討論中国党第六次大會的决議，

討論整个的党的路線問題。

原来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間，中国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北方局曾經有过這種極端民權主义的要求，他并且实行起来，隨後的結果，簡直是使党大々的削弱，弄得糟不堪言。陳獨秀現在的要求自由討論要自由批評，要求討論党内民權主义的廣泛，自然，更加是孟雪維克主义的充分表現。他現在"為着党内民權主义而鬥爭"他是為着什么？他是為要党服從他的取消主义，要党和無產階級相信：(一)中国資產階級政權已經形成而且在穩固發展；(二)軍閥混戰不过是中国資產階級發展的特殊过程；(三)凡是反对封建的革命裡，必須和資產階級妥協；(四)現在既然是資產階級已經戰勝封建階級的局面，那末，無產階級只有投降，而接受民族主义的口号，帮助中国資產階級，勸他不要誤国，(五)因此，不要準備什么暴動，而要取消革命的高潮前途，实行合法運動。他是為着要使無產階級的政党服從資產階級而鬥爭呵！

三

陳獨秀的反党鬥爭，現在已經是公開的樹起取消主義的旗幟。但是中国革命問題上還有許多份子，他們亦許表面上也反对獨秀，可是用更巧妙的更隐藏的方法，傳佈他們的机會主義到中國共產党裡去，他們在中國党內是現時的主要危險。事实上，他們是陳獨秀主義的奸細。

中國革命問題裡，往往有許多企图，想要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對立起來。共產国际曾經屢次的說：「中國的統一以及從帝国主義压迫之下解放出來，都是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餘孽的肅清，不可分割的联結在一起。然而能解决這些資產階級民权革命的主要任務，却只有在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工農革命是最大的新高潮的基礎之上，方才能够实現。这個高潮的條件，無疑的是在成熟起來，他不能不引導到建立蘇維埃，用來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权獨裁的机関」。

陳獨秀的見解，剛剛相反。对於他，「中国革命的失敗等於中國資產階級戰勝封建階級，他事实上承認土地革命的問題，已經不再存在，而只剩得民族解放的問題，這一問題上帝国主義也已經对于中國資產階級有了好些讓步，所以，無產階級不要希望中農群衆还要土地革命，却要帮助資產階級，使他不要「誤國」，以完成民族的解放。這樣，所以他認為「必須除階級口號之外，再提出民族的口號」，方才能够征取無產階級之外的群衆」，照他的意思，(一)土地革命的口號是不能号召中農群衆的，土地革命是和民族解放革命是沒有関係的；(二)無產階級口号是和所謂民族口號相衝突的不能並存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領導民族解放的。

因此，他認為資產階級雖然叛变，他却能够得到帝國主義的讓步，從此之後，中國革命就告了一個段落，——當初共產國際的發展土地革命而爭取武漢政府，以

反对蒋介石叛变後的南京政府的政策，是不对的。照他的意思，这是帮助資產階級得取政权。可惜！不但取消主義的陳獨秀是这樣說法。新近莫斯科共產學院出版了一本魏金斯基的書，題目叫做„中東鐵路和帝国主義的对華政策"；魏金斯基同志在這本書裡說：》中國資產階級，就是左派國民党……從去年（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漢的中央就已經和南京„互相競爭着右傾"……——南京中央对於武漢的勝利，实际上在去年四月就已經完成了"（„中東鉄路和帝國主義的对華政策"第九頁）。照這樣說來，左派国民党在武漢政府時已經是叛变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四月間，南京政府剛々成立，就已經克服了武漢。那麼，共產国际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擴大會議（一九二七年五月）对於中国革命的决議案，真还是帮助資產階級得到政权的路線了！魏金斯基同志，本根不提起土地革命的問題，沒有看見武漢時代無產階級及其所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是當時武漢的中心勢力。他只看見武漢國民党領袖的動搖和妥協，就立刻得到一個結論：說武漢已經失敗——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蒋介石叛变，就是資產完成自己的勝利！

魏金斯基比陳獨秀進步些，他說資產階級怎樣的投降帝國主義；但是，照他的意思，亦是中国資產階級能够决定一切命運。他說：„現在甚至於对外國資產階級都已經明白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但不代表中国人民，並且和正在鬥爭的群衆離開，資產階級和群衆之間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因此（？）英日法美帝国主義有新的反对中國的進攻行動"（同上，第七頁）。第一，資產階級和群衆之間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是不对的，而是資產階級实行屠殺群衆了！第二，照他的意思說来，彷彿如果資產階級还能代表中国人民，那麼，帝国主義就不敢進攻中国了！陳獨秀勸共產党現在要警告国

民党不要誤國，魏金斯基却勸資產階級再來代表中国人民，——他向中國資產階級說：現在（1928年）帝国主義固然不再反对整個的国民革命運動，而只反对工農運動（！）然而將來你的"政策的邏輯"一定要使帝国主義又要一天天的進攻你（中國資產階級）的，你還是來代表中國人民罷！（同上，第十頁）

魏金斯基同志還沒有承認這個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在"每一縣都取得了政權"。但是他說："最近兩年來（1928—29年）國民党進化到变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党，在総的反革命營壘之中，在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的指導之下，爭取自己的領導权"。（同上，第十九頁秋白加点）。"蔣介石占領北京而得到形式上的統一中國……引起反革命營壘的一切力量，对於南京表示極大的反抗，這些力量，以前是同着中資產階級反对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同上，第二十一頁，秋白加点）。不但魏金斯基，还有一位同志，署名S.B.的，在达林同志主筆的中国劳動共產大學中國問題科學研究院的机関雜誌"中國問題彙刊"第一号上，做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反動營壘之中"；——他在這篇文章裡說：廣西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執行委員会第五次全体會議上公佈的政綱，"是中國反革命的封建買辦派的最終形成的綱領，這個中国的反革命是直接和（反動營壘內部的）資產階級派（蔣介石等）相对抗的"。（"中國問題彙刊"第一號，第三百十四頁）。他并且說，廣西派的政綱"是中國公開的封建軍閥復辟的政綱"（同上，第三一八頁）。魏金斯基的文章，是論述一九二九年三月間中國國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會的，S.B.同志的文章，是論述一九二八年七月間中國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体會議的。國民党這兩次會議之間，有許多重要的事変，可是，這些事變的"大小"

能够使魏金斯基和S.B.分家。他們两人的意見，有些相同的地方？(一)中国資產階級已經勝利，封建買辦和軍閥对於資產階級正在"極大的反抗"，正在"直接的反抗"；(二)封建勢力固然还存在，但是中央政权已經是資產階級所領導，中国革命的結果是資產階級占着優勢，現在的問題变成了封建軍閥能不能够復辟的問題；(三)沃林同志把"反革命"和反動"分開，彷佛中國資產階級只是反動，而不反革命，中国的封建買辦方才是反革命的，这個反革命是和資產階級对抗着的；(四)魏金斯基同志，更進一步的說，帝国主義在那裡指導着中国資產階級去和中国封建買办爭領導權呢。

這種觀点，顯然是極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根據這種观点，所以會發生中国資產階級能够統一中国的理論。

照魏金斯基同志的說法，中国資產階級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指導之下，能够統一中国。他說：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和現在的国民党，的確有理由可以去做資產階級的領袖"（魏金斯基的中東鉄路和帝国主義的对華政策"第二十四頁）至於廣西派，閻錫山，馮玉祥等，"客观上是不是一方面代表封建地主的利益，另方面，代表于工商業資本的一切階層，而反对大資本主義的發展呢？我們想起来，的確是這樣"（同上，第二十三頁）因此，他的結論是，所以南京和廣西派的战爭，以及正在成熟起来的反对馮玉祥的战爭，都是中國資產階級爭取中央集權的鬥爭過程的表示，亦是美国帝國主義排擠英日勢力範圍内的表示"（同上，第二十二頁）照沃林的意見，中国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个樣，亦能够真正的統一中國，而且不一定要帝國主義的幫助。他居然还承認：帝國主義是依據在中国的半封建的社会関係之上，依據在割據分裂中國的軍閥制度之上。這就算是他比陳獨秀

，魏金斯基高明的地方。但是正因為如此，他簡直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和外国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是主要的矛盾。他說中國資產階級反对軍閥制度，所以也就是反对帝國主義（中國問題彙刊第一號第三百三十二頁）不但如此，他还認為中國資產階級能够实行拿破崙主義，他說，„很明顯的，能够真真統一中国的，或者是資產階級，或者是無產階級。……這樣在資產階級的中央集权之下，只有一種軍事力量能够統一中國，這種軍事力量不但要反映資本主義傾向集权的歷史趨勢，而且要实际上和資產階級（正是和大資產階級）联結起來"……張作霖等等以前曾經企圖統一中國，可是"這些企圖的破產正可以証明：沒有大資產階級來贊助這種企圖，統一是一定要失敗的"（同上，第三百三十七頁）這兩種"理論"雖然和獨秀的"戰爭的資產階級發展過程論"有些不同，但是，同樣是只看見中国的大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有很大的对抗。因此，認為中国資產階級或者在帝國主義指導之下努力去消滅封建殘餘（魏金斯基），或者在中国的„拿破崙"的中央集权之下，堅决去取消軍閥的割據（沃林）。中國同志之中，也有这種"大理論"，不過比較起來，沒有這麼樣"類似馬克司主義"罷了。有的誇大美國帝國主義的„統一作用"，甚至於引導非殖民化的理論；有的誇大資產階級„反封建性"甚至於說他根本仇視軍閥制度。前者，有同志甚至於說"蔣介石代表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他們要中央集权；汪精衛的„社會力量"之中却包含張學良，閻錫山，廣西派，又代表小資產階級和小地主，代表舊式的小資產階級（錢莊資本等々）和新式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他仍要地方分權。總之，這種誇大蔣介石的作用，誇大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趨向"，都是顯然投降陳獨秀主義，顯然的機會主義。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是解放中國，統一中國，肅

252791

ИНСТИТУТА ЛЕНИНА

清封建的民族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中國革命不推翻帝国主義的統治和地主階級，是不能勝利的。而沒有農民"来贊助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他們。機會主義者現在却在假清高的說中国已經只要階級革命，不要"民族革命"。其實這是要無產階級拋棄對於農民的領導權。這些机會主義者，為着這個目的，努力証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已經在鄉村之中有了富農做他的社會基礎，同時，却說資產階級已經國民政府的領導階級，能够实行統一中國。機會主義"通常是忘記了一件"小事"：中國封建残餘是仍舊占着統治地位的情形之下，还有極廣大的農民群衆是在劇烈的鬥爭，他們是現在革命階段之中中國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联盟并沒有能够解決土地革命的問題，甚至於極端不澈底的改良方法，也不能實行。據機會主義者的見解却是："現在富農已經因為分化的結果，同着地主反對農民，這樣便成了國民党在鄉村之中的柱石……所以國民党第三次大會上，中国資產階級能够答應富農的唯一辦法——就是鄉村自治，這可以使富農有得到政权的可能"（魏金斯基的中東鉄路和帝国主義的对華政策"第三十二頁）這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已經能够開始"改良"農村政權，實行民權主義，而且已經有了"鄉村中之社會基礎——中国並不用解決什麼土地問題。照魏金斯基說來，土地問題本来用不着說（他一个字也沒有提起）；資產階級所不能够实行的，只不過是："大規模的灌溉工程，農業技術上和建築工程上对於農業的幫助"（同上，第三十一頁）這種觀点，事实上也承認中国革命已經告了一个段落，即使口頭上还說中国資產階級民权主義革命的任務还沒有解決，实际上的一切論斷，都是說：資產階級的中央集权已經开始，雖然有許多困难，譬如沒有經費实行大規模的灌溉工程等等，可是已經，開闢了一

係特別的改良道路，逐漸向前進化——全國範圍內实行統一的戰爭，工業方面借美國資本的幫助開始保護政策 протекционизм 鄉村方面扶起富農來掌握政權……這是多麼„樂觀"的前途啊！

可是，機會主義者之中，也有人不滿意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認為他太妥協，說：——还有„更革命的"資產階級，起來催促蔣介石的統一集权改良政策的实行呢！譬如：„国民党左派同時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那些階層，這些階級不能不„悲觀"，不能不„拼命"，不能不反对帝主義和„封建勢力"在國內的完全勝利"（中國問題彙刊，第三百三十三頁）所以，國民党改組派發動起来反對蔣介石的時候，這些機會主義都高興得不了，說：這是„不得不反对帝國主義和封建势力的民族資產階級"起來了，這是"中國拿破崙的思想時代"行動起來了，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春天"開始了。

就是再進一步的同志，他們看見了：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統一，肅清封建的任務，是没有解決，是資產階級所決不能解決的；他們看見了：因此，全国的政治經濟危机又爆發了，中國工人運動及農民游擊战爭的新高潮又開始了（他們的估量固然不够）他们还能够批評沃林同志„資產階級統一中國論"的機會主義。但是譬如莫斯科紅星報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的社論，就是這樣：他指出沃林的右傾之後，自己又說："統治聯盟內部的糟糕狀態的第一个表示者，就是小資產階級……他（小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九年——造就造成功整整三个新政党：所謂„第三党"，國民黨改組派和急進派（馮玉祥部下的郭春涛等——秋白註）。這樣，紅星報認為馮玉祥，改組派，都代表了小資產階級，而且小資產階級也到了統治联盟裡去了！而且他所看見的革命危机的表示，不是工人運動和農民战爭，却好是小資產階級，這仍

舊是一塌糊塗的观点。至於机會主義的魏金斯基，他簡直的說：汪精衛的左派国民党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他們高叫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自由，所以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一定要反对他们；所以蔣介石和"中国的資產階級又反對封建軍閥，又反对小資產階級，而要使他們都服從自己"（魏金斯基的中東鉄路及帝國主義的对華政策"第二十六頁）然而更可笑的是，他說"馮玉祥是模範的富農代表和手工商業資本的代表……國民軍直到最近還是這樣一種性質的軍隊，在不打仗的時是做和平劳動的修築鄉間的道路和做手藝的。馮玉祥自己和軍官的生活是很樸素的，和兵士差不多……這个軍隊有特別的性質，好像是一个高級低級兵士的大團結"（同上，二十三頁）這裡馮玉祥的理想化，簡直到了神奇大怪的地步。親愛的魏金斯基！你被馮玉祥的宣傳和作偽完全騙信了，我很佩服你的本領，竟會把軍事式的農奴制度，當做天下第一等的民权主義的軍隊，當做富農的武裝統治力量！

總之、這些机會主義的種種表現，都是根本不明瞭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題——都是簡接直接的在某種程度；由承認中國資產階級在這革命之中，一方面战勝了工農群眾。別方面战勝了封建勢力——中國革命告了一个段落了！

米　米　米

中國從十九世紀中葉以来，資本主義的関係自然是在發展，封建宗法式的經济是在崩潰。但是，帝国主義的侵略中国，同時，維持着封建関係，僅僅加以形式的変更，以適應財政資本的剝削，中国資產階級経常的回轉他的資本，到高利貸和封建式的土地私有制度裡去，而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之後，更加和封建勢力結合联盟而向他投降，并且資產階級的經济利益已經和各国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密切的混合生長；所以，中国資

產階級決不能够造成什麼新的中国。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連俄国當初那樣的斯託柳賓的政策，也不能實行（參看我的„論国民黨改組派"）。俄國在斯託柳賓政策之後，列寧尚且屢次說，堅決的主張，„新的俄国还沒有"，„新的俄国還沒有造成"（列寧集卷十二上册二八九頁，„談談反对立憲民主黨主義"）

中国革命雖然暫時失敗，然而革命的任務仍舊是„舊的"。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列寧論到俄国的民权革命（一九〇五年）失敗之後的情形，曾經說過：政權的百分之九十九還是保存在專制制度和地主的手裡，他反對當時孟什維克的意見；孟什維克當時說：大資本的代表早就在俄國，占着了完完全全的統治階級的地位。列寧反駁他們說：這完全是誑騙。這裡忘記了君主專制，又忘記了政權和收入仍舊在地主農奴主手裡，葉尔芷斯基柱然以為只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年我們的君主專制方才不是純粹的農奴制度性質。其实，同尼古拉一世時代比較起來，亞力山大二世時代，就已經不是純粹的了。然而，如果把農奴制度的統治把丧失純粹農奴制性的農奴制度統治，把向着資產階級性的君主政体方面移動幾步的農奴制度統治——把這種統治和„大資本代表的完全統治"混淆起來，這是絕对不可寬恕的"（列寧集，卷十二上册，一三八頁）中国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封建軍閥地主在國際帝国主義的指揮之下，仍舊掌握着極大的政权，僅僅土著的大資產階級得到相當的參加，而且這裡的大資產階級之中，雖然不是純粹只有買辦和銀行界，可是極大多數还是買辦資產階級和銀行資產階級——蔣介石派，西山派，廣西派，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安福系，陳調元，唐生智等等，都是這種買性的联盟。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们現在時代（一九二五

年）每一次的危機裡，必定有農民的"純的民權主義運動"發動起來，如果不顧到這点，那就是根本的錯誤，事實上一定引導到孟塞維克主義至於中國資產階級，尤其是現在時候，他不但不會參加這種"純的民權主義運動"，亦就是真正反帝国主義的革命運動，並且是這種運動的敵人，中國現在的富農，也是如此（參看我的"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共產雜誌第一期）現在代表中等民族資產階級的國民党改組派，甚至於上海大資本的代表，都只敢在帝国主義和封建軍閥面前，跪着哀求一些"狗吃的肉骨頭"；——中国革命初期參加反帝国主義運動的民族資產階級，早已完全背叛革命，這種背叛的原因，共產国際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已經明確的指出，此地不再贅述。現在中國資產階級比一九0五年後的俄國資產階級還要不如，還要卑怯，還要下流。列寧說當時俄国資產階級的話是；資本家不敢談到純的政治問題。他們懇求的"勇氣"，有一个限度，就是——在某種中央或地方機関裡面，"准許工商業的代表參加"。至於說一般的這種機関應當怎樣組織，那末，他們連想都不敢想。他们只敢把按照別人的命令所形成的現成機關做根底，而哀求幾個位置。他們像奴隸一樣，站在不是他們階級所造成的国家基礎上，而去為着自己這一等級，自己這一集團，自己這一階層的利益懇求，甚至於在這裡也不敢談到廣義的全階級的利益"（列寧集，卷十二上册，一三一頁）汪精衛的"訓政時期"和以"党治國"的實際意義，就只不過是這樣，他的所謂廢除治外法權，所謂國際平等，也是這樣。就是上海商會請求加入胡漢民的立法院，又何嘗不是這樣！胡漢民尚且申斥不准呢。

機會主義者却只看見中國資產階級參加，甚至於"領導"國民黨的政权，而且企圖假裝着"純粹無產階級

5454

的政治家"，高叫"無產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現在不要联合小資產階級，現在只要革命深入，不要革命擴大"；因為什麼？——原来是因為南京政府至少已經是大資產階級的政权，汪精衛派亦是負責參加政权，决不會是在野党，就是新舊小資產階級亦已經整個兒的反動，——現在只有階級反對階級，無所謂平民反对地主，只有城鄉無產階級反对城鄉資產階級的鬥爭，無所謂联合全体農民"了

其實，"說民權革命，而又只限於簡單的，單純的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立着。這是完全不適當的，因為這个革命，正是在這樣一个社會發展時期裡面，當時社會裡的群衆，恰好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而形成極其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階層"（列寧集卷六，一二五頁）而且農村無產階級與農民資產階級之間，有一个中等農民的階層，他的地位之中，有那兩個"矛盾東西"（antepods）的雙方的特点。所有這些階層的地位之中，全体農民的地位之中的共同特点，就無疑的使農民的全部運動，都成為民权主義的運動，——不論其中的不覺悟性或者反動性的表現有多麼樣大"（列寧集卷六，一一四頁）。中国的特殊情形，還有反帝国主義的民族解放問題，這使農民群衆的土地革命，真正掃除帝国主義对華統治的根底的革命，尤其增加他的重要意義。

列寧說："在現代的俄国，充實革命的內容的不只是兩個互相鬥爭的力量，而是兩種種類不同的社會戰爭：一種战爭，是在現代專制農奴制度的內心；別種战爭，是在將來的，現在已經在眼前生出来的資產階級民权制度的內心。一種是全體平民爭取自由的鬥爭（爭取資產階級式社會的自由），爭取民權主義，而就是爭取平民專制；別種是：——無產階級為着要建立社會主義的社

會而反对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列寧全集，卷六，四八七頁）"沒有完全消滅一切中世紀式的土地私有財產，沒有完全的，肅清"，就是，沒有土地国有，那麼，這樣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無產階級的政党的事，正是要傳佈這個最徹底最激烈的資產階級性的土地革命口號。等到我們实行了這個，我们再看一看：以後的前途是怎樣；我們再看一看：這個革命是否成為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力可以有美國式的速度去發展的基礎，還是，這個革命成為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列寧全集，第二版的第十二卷，第二九四頁）。对於中国，這個土地革命，已經不是，是否西歐社会主義革命的序幕"問題，而是是否單国的成為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繼續，以及欧美日本社會主義革命的推動力的问題。中国土地问题裡的所謂"美國式發展"的問題，必定不可避免的，要在中国革命自己轉變到社会主義革命的過程裡，变成所謂"蘇維埃式發展"的問題。可是，暫時，中國的土地革命，正表示着中国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反抗帝国主義的獨占資本及中國豪紳地主的束縛和剝削，而要求"美國式的發展"；這才是真正"代表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而能够反对封建殘餘及帝国主義的革命力量——就是農民"群衆。（參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報告。）

中國的機會主義者，却偏要到資產階級裡找這樣的力量。

"馬克思主義裡的俄國機會主義，就是孟塞維克主義的特点，現在正在於他（孟塞維克主義），聯結着一種學究式的手段，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曲解他的字面而背判他的精神……、孟塞維克派，反对着民粹派的不正確的社會主義學理，自己却學究式的忽視了，放过了民粹主义裡面在歷史上有真實意義的，有進步意义的内容，就是一種群众的小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這

種鬥爭是民权主义的資本主义反对自由派地主的資本主义的鬥爭，這是"美國式"資本主义反对"普士式"資本主义的鬥爭，因此，他们說農民運動是反動的，說立憲民主党比勞動派要進步些……這是神奇古怪的瘋癲的判徒的見解"。（列宁到史鉄邦諾夫的信，1909年十二月十六日，見"無產階级革命"雜誌1924年五月号的第178頁）。中國的机会主义者，更不用說取消主义的判徒，亦有這種"特点"，他们亦是否認農民战爭的作用，反而把軍閥混战解釋成為"統一""和""割據"的战爭，他们亦是否認農民群众的民权革命力量，反而把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当做"中國的拿破崙"，說中農已經不穩固了，游擊战爭不过是反動的無政府的盲動罢了，或者呢，說革命不能再"擴大"了，現在只好限於無產階级一階级的運動的"深入"了。

四

因此，資產階級的叛变，投机会主义的观察，已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全部命運；革命高潮從此就，渺々無期的推延"了，甚至於跟着帝国主义者說：中国革命完全消滅了。帝国主义的机関報，英国的，經濟學家"雜誌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寫道：，中国革命，好像浪波在海洋面上括过去，括过之後，已經一点痕跡都沒有了。"中国革命一点痕跡都沒有了！我們的，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居然稱贊這種估量是"很準確的估量"，（見，中国問題彙刊"第一号第三四四頁）。

廣州暴動之前就興起的農民游擊战爭，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雖然時勝時敗的，可是一直繼續有在到如今，最近而且有很大的発展。，红鏢会"，，大刀会"，"神兵"，光蛋会"等農民群衆的武裝鬥爭，當然大半還在反動份子領導之下，可是廣大群衆的參加和発展，也是從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一直繼續到如今。一九二八年以来，繼續着廣州暴動中兵士的參加而屢次有軍閥兵隊的崩潰，兵士群衆轉到中国的工農紅軍方面来。尤其重要的，是經廣州暴動的嚴重失敗，到最近從今年五一起直到現在，發着極大的摧殘的城市工人運動，顯然的又進到新的高潮，而逐漸走向能够領導起一般的農民战爭的狀態。五卅，八一，九一（上海）以及十月革命紀念（廣州）工人的示威運動和政治罷工，明顯表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在日益增長起来。而且新的青年的學生運動又開始活動，在上述的工人示威之中，往々有青年學生參加。學生之中的分裂，顯然表現，老輩"的，三民主义忠实青年"和學院派的灰心失望的青年，是反動，是依附汪陳派或者譚平山的第三党，而青年的新的，後輩"，無產階級化的貧民學生，生長出一種新鮮的力量，新的階層。尤其是工人運動之中青年的工人，初從鄉

下上城的工人帶着新的青年的力量，灌輸到革命鬥爭裡来。机会主义者說：這是"新由鄉村来的份子代替了旧的有鬥爭經驗的份子。"其实，只有"自由派，以及受自由派影响的人，直正要認为這是運動初起時候的弱点。事实上，這却是運動的强点的象徵。新鮮的青年力量的增加，正是運動的鞏固，活潑和革命性的保証。就称新鮮的力量，是沒有受过战鬥裡的鍛鍊，……然而他們也沒有像許多"过去的人"一樣，受过苦的失敗而麻木起来。新的工人越是積極，越是声浪放得高，那么，"老輩"的工人領袖越是快的回到"隊伍"裡来，他們開始医好过去受着摧殘的傷痕；我們老輩工人之中，有許多是不顧一切的留在社会民主党之内的，他們現在也越加覺得勇氣的增高"（列寧全集，卷十一，下冊一七五頁）。

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長——不管取消主义派或者机会主义派，以及脫洛茨基派，怎樣的"預言"，怎樣的歸罪到中国共產党的指導，說是盲動主义斷送了党，游擊战爭削弱了党，說是沒有党，革命高潮就無論如何也不会来的等等。事实上完全是相反。第一，"並非游擊行動破坏我們的運動，而是党的薄弱不会把這些行動拿到自己手裡来……自然絕有極有的經济政治原因，所以引起這些鬥爭（正在十二月暴動之後，游擊战爭普遍起来，可是這種鬥爭，和經济的，以至於政治的危机，是有密切的联繫一定是無疑义的）。並非游擊战爭使党惡化，而是游擊战爭的無組織性。一切新的鬥爭方式，都帶着新的危險和新的犧牲，不免要破坏或者削弱对於這種鬥爭沒有来得及準備的組織（党部）。一切軍事行動，在無論甚麼战爭之中，絕要引起参战的隊伍的相當破坏。决不能因此就說：不應當去打仗，只應當說，要在战鬥裡去學会打仗。"第二，現在新的革命高潮

已经明显的把全国客观上的政治经济的危机，对於革命高潮的影响和関係，指示出来。固然，必須主观上有這樣能力的階級，能够去轉変全国的危机，使他引導到革命。但是，如果認為這个階級的党沒有組織好以前，革命高潮就一定不会到来，那才祇正是弄得事実上来不及準備到新的鬥爭，以致於受着更大的破坏。現在中国軍閥混战又有全国爆発的事実。封建式的割拠，和巨大的經済危机，以及帝国主义列强（英，日，美）把中国當做鬥爭的舞台和目標，所有這些，都引起中国豪紳地主大資産階級联盟的各省地方政府（南京政府是其中之一），各系各派軍閥之間的不断的战爭。工農群衆已經不但用示威，並且用刀槍"投票"反对軍閥混战，而贊成把軍閥混战変成階級的国内战爭，把国民党替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战変成武装擁護苏联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爭。誰不看見現在中国的軍閥混战，足以引起革命的民衆的反抗，誰就根本不知道革命党人的責任！當歐战的時候，俄国布尔塞維克的党，亦是"破坏"得很（参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五頁以下）。但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爆発了。所以認為革命完全只靠我們的党，而我們的党已經被盲動主义"断送了"，於是乎說："战爭是固然在中国開始了，可是革命高潮始終也推遲了些，直接革命的形勢却未必見得一定会来"，這種論調，除出說他是机会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名稱呢？"変現在的軍閥混战為階級的国内战爭，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爭"這是唯一正確的無産階級的口号，亦就是唯一正確的民族解放的口号。無論這種轉変是有多大的困难，既然战爭已經成了事実，共産主义者就不管怎樣，都應當有系統的不動搖的堅决的去準備這種轉変的工作。

至於还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和傾向，例如：（一）認為反革命營壘之中的衝突本来只是軍閥的各派，大小地

主，大小資產階級的各系之間一場糊塗的混鬥，無所謂政治上的分裂成為兩个政治集團，無所謂中等民族資產階級形成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的新的企圖（改組派）想来阻滞革命，而掩蓋軍閥混战是帝国主义地主資產階級反对工農民眾的战争之实質；因此說，只要利用這種衝突発展些我們的組織和力量，藉此争些自由，或者（二）認為国民党改組派是代表進步的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甚至於說是代表一般的小資產階級，說他們拿着武器而实行反封建的战争；因此簡直有人提議和改組派联合共同争些〝公民的权利〞，提議和譚平山的第三党联合，以準備将来和他共同組織工農民权独裁的可能；（三）或者認為農民战争往々都是〝脫离群眾的〞盲動，没有什麼多大用处，只要專做工農的经濟日常鬥争和所謂組織工作；而且彷彿是為着争取工人群眾，必須在经濟鬥争裡处々得着黃色工会官僚的許可然後行動，或者要去〝推動黃色工会懦弱的領袖来革命〞，甚至於有人根本認為赤色工会没有前途，簡直要取消赤色工会，專做合法的黃色工会裡的運動，鄉村之中也只要去〝和平発展〞，專反对所謂〝一切種々的農民資產階級〞（事实上大半是地主半地主）的经濟鬥争，成為鄉村和平的经濟主义〞；（四）或者認為無產階級太孤独，既然中国是資產階級民权革命，那就應當找着〝資本主义的革命的〞富農来联合，或者找着〝資產階級民权派的〝整个〞學生階級〞来联合。凡是這些观点——机会主义的見解和傾向，都是忽視無產階級的領導权，忽視共產党的独立領導作用，忽視争取群眾的總任務，削弱反对改組派的鬥争，削弱解放群眾於資產階級豪绅富農工会官僚等反動影响之下的鬥争，這亦都是对于群眾的自動力量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对于反革命勢力的估量过分。结果，都只要拋棄領導工農去争取政权的總

任務是走上可能主义的合法運動。

現在，工農革命高潮的生長，对於地主資產階級都已經成為顯然的危險，他們覺得生死關頭日益的接近。上海的商会和商民联合会是在撒嬌的不肯接受公債。汪精衛陳公博等是在裝腔做勢的玩耍在野党的把戲，企圖勾結帝国主义，平定工農的"大功"。然而真正的政权是在帝国主义手裡，是在帝国主义的"使臣"蔣介石，張學良，馮玉祥，張発奎等類等"的手裡。他們的統治平民，用的是槍炮。所以現在中国平民和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向蔣介石等"爭得些什麼自由权，而是要奪取他們的槍炮，他們的政权。為着這个目的，必須要独立的領導，贊助，擴大群衆的鬥爭，首先就要組織和組織——秘密的布尔塞維克的党的政治上的鞏固和加強。當然，要会適當的去联結公開的工作方式。然而主要的是：沒有秘密的党，布尔塞維克的一致的党，便不能实行群衆運動裡的一切工作。贊助並且擴大群衆運動和游擊战鬥的時候，應極端注意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经驗解釋武裝暴動的必要和不可避免——預防已經大致糾正过来的盲動主义。群衆罷工的生長，其他階級的引到鬥爭之中来，組織的情勢，群衆的情緒——所有這些，都自然会指出適當的時机，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对於国民党的軍閥統治，实行堅决進攻的决定勝負的总襲擊。沒有工農的武裝暴動，去推翻国民党的軍閥統治，中国是不会有勝利的革命的。

× × ×

堅决的战鬥日益接近了。取消主义派已經公開的抗议，反对"把他們送到有生命危險的地方去"了。取消主义冒充着列寧馬克思的論調，帮助資產階級来阻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战鬥了。机会主义的趨勢，其实也是如此。

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却有一个„優点”：他們要躲避布尔塞維克的攻擊，求得机会主义的„和平発展”，所以常々是含混模糊着一切为着党的紀律和一致的鬥爭。他們唯恐怕自己的机会主义暴露，所以反对提起„机会主义”及一切関于”傾向”的”罵人的話”。他們常々是從”党内和平”的口号開始。

布哈林在国际第六次大会時，就特别着重”和平團結，親密合作，”而不提党的紀律。這是要求布尔塞維克的路線，去和一切离開这路線的傾向無原則的”和平親密的合作”！布哈林对於中国党内的情形，曾经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廿九日（国际第六次大会前幾天）說过這樣的話：„党中上層智識份子，若発生了這樣的极無原則（？）的鬥爭，則我們决要号召動員，劝使工人去反对他們。工人是没有智識份子那樣好鬥的。當然，我並不是說永久不需要鬥爭，有時亦非鬥爭不可；但是，在現在的条件之下（為什麼？）所有党内鬥爭都不是因為原則的政治観点不同，乃是因為各種派别不同而鬥爭。如果你們中間仍旧有像統治階級（国民党）中間那樣的鬥爭，那末，劝使工人来支对智識份子的領導，是必要的……要的是党，而不是什麼英雄的集合。英雄或者能够英勇的死……但他不能整理党的生活，使他不発生破裂……沒有這一点便不能発展党，也不能発展革命；這就是要尽量打擊地方主义，打擊排除異己的心理（憎嗣與自己意見不相同的人的心理）。”……”我想起：汪精衛宣言，說胡漢民錯誤了，胡漢民宣言，說汪精衛錯誤了，都要做錯誤，都要因為别人的錯誤而砍别人的頭。同志們，這種国民党式的办法，不要搬到我們党裡来罷！”（這裡所引的是中文出版的譯文，我手边沒有俄文的原文）。這樣說来，共產党内存在好些不同意見是應該的，不必辯明那種意見是党的意見，

那種意見离開党的路線有多麽遠——一切都應當容忍。凡是党內発生破裂，就是党沒有好的指導。而且，据他的描寫，彷彿中国共産党自從八七会議之後，只有無原則的"互相殘殺，像国民党內一樣。再則，他還"恭維"工人同志，說工人同志是不"好鬥"的能夠容忍一切，直到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所以他要勸工人起來反对智識份子的領導。

布哈林的這種論調，當然对於中國共產党有相當的影响。大約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中国党的中央裡，有一个同志，特別提出"党內和平"的口号，正是指出"布哈林的精神"発揮起來的，他鄭重說明這種"布哈林精神"有保持的必要。這種党內調和主义和容忍主义，當然是和列寧主义不相容的，固然，地方主义，个人糾紛等，对於無產階級的党是極端有害，必須消滅的。可是，這决不是"和氣容忍"的口号所能夠糾正的，正必須有明確的政治路線，堅决的求得布尔塞維克的一致，而掃除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意氣之爭；同時這就要有鉄的紀律，——而不能用"互相赦罪"的办法，掩蓋一切錯誤。

這種党內和平主义，到現在还可以看得見他的影响。當共產国际執委最近决定："党應當肅清自己隊伍，去掉暗藏的脫洛茨基派及取消派"（陳独秀等類的人）之後，还有同志很滑頭的申明：他"很贊成对于陳独秀問題，做詳細的思想上的解釋運動"，而不答覆：他是否贊成共產国际决議案裡的這一句話。這種对取消主义的調和態度，正是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將要完全和取消主义合併起來。照布哈林意思，对於陳独秀及其調和派的鬥爭，亦祇是个人糾紛的鬥爭，亦祇是"排除異己"的心理，亦祇是"好鬥的"心理——亦必要号召"党內工人階級"起來反对"党內智識階級"嗎？

列寧主义和机会主义絶对不同的地方，正在於列寧

主張嚴格的民权集中制和鉄的紀律。誰要用"調和容忍"的原則，去"号召工人階級反对智識階級"，誰就是不可救藥的机会主义者。

列寧說：這是『武断的企圖，要想使"庸衆"和"領袖"对立起来，在"庸衆"之中煽動起愚氓的虚荣的本能，破坏群衆对於"十幾个聰明人"的信仰，而使運動喪失他的穩定性和鞏固性』……其实『沒有"十幾个"有才幹的（有才幹的人不是幾百幾百的生出来的）受过鍛練的，革命職業上有準備的，受着長期學校式訓練的領袖，互相之間能夠合得来的，——那麼，在現在社会之中，無論那一个階級，亦不能進行堅决的鬥爭』（列寧全集，卷五，第二一七頁）。『這樣的組織裡（指戰鬥革命家的組織，秘密党而説的——秋白註）既然同是党員，就應當取消工人和智識份子的一切分別……』（同上，第二一〇頁）。

五

總而言之，中國的取消主义（陳独秀），現在認為封建已経只剩餘的剩餘根本無所謂土地革命，只剩得民族主义的任務，还要等無產階級去帮助資產階級完成，所以認為应當取消階級的口号，提出民族的口号，而去联合所謂"民族主义的無產階級之外的，不能無条件接受無產階級的階級口号的廣大群众"。——事实上，是投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至於地主和帝国主义。

機會主义呢？——或者認為蒋介石是集权的統一的反對封建割據的進步的資產階級，這在邏輯上的結論，应當是贊助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統一战爭"。或者認為汪精衛派是中国拿破崙的思想代表"不能不实行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爭，因此，要推論到贊助"国民党的改组战爭"，至少可以得到些自由权。或者，認為汪精衛等的改组派，甚至於馮玉祥的所謂"激進党"，代表整個的中国小資產階級，能夠反对豪紳地主和"寄生資本"的；所以，居然有公開主張联合改組派的提議。或者認為資產階級固然完全反革命的了，可是既然中国还是資產階級民权革命，那就一定要找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权派"来联合：有人猜着——這民权派是學生的智識階級罷；有人猜着——這是黃色工会的"懦弱領袖"罷，又有人猜着——這是資本主义的富農罷。

恰好偏偏沒有猜到農民群众！

還有假清高的"純粹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說，現在什么都不可以联合，否則，又要像加入国民党時期一樣，"使無產階級溶化在資產階級的民权主义裡面"。

对於這些取消主义及一切種々机会主义的傾向，可以用列寧的話来回答。列寧对于孟塞维克派說布尔塞维克不知道"無產階級溶化在資產階級 民权主义裡面的

危險"的話，回答道：

"社会民主党（共產党）既然在資產階级社会的基礎之上行動，如果那么不在某種各個的場合裡，同着資產階级民权派同路走，那就簡直不能参加政治。（列寧認为1905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级的革命，是徹底推翻封建農奴關係的革命，然而不是資本家的革命，却是農民对地主的農民革命"，——秋白註）。我们（布尔塞维克）和你们（孟塞维克）的分别，在於我们同着革命的共和主义的資產階级同走，而不和他们混合；你们却同着自由派君主々义的資產階级同走，而不和他们混合"；……"如果，附加些条件，我们亦不可說：農民群众就等於革命的共和主义的民权派"；……我们有意"去提高這些革命民权派成份的程度，使他们和我们自己一樣，能夠去鬥爭而不是只会叛賣"……你们却"無意之中自己降落到地主群众的程度"，（列寧集，第二版的第八卷第五四——五五頁）。

中国的机会主义吟々罷：你們亦是拒絶領導農民群众的徹底推翻封建地主及買办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資產階级民权派"，却想尽方法，去尋找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奸細，反革命的資產階级民族改良主义，青天白日主义的富農和工会官僚等々来可并合，甚至於自己落到"地主群众"的程度（季諾金斯基認为馮玉祥的軍隊是民權主义的軍隊！）。

中国現時正因为封建势力还佔着统治地位，鄉村之中"資產階级式的土地制度决没有発達到已經不能從所謂"普魯士式"的發展道路上，突然的轉変到"美国式"的，以至於"苏維埃式"的道路方面的程度，——还差

得很遠呢！所以中国革命的現代口号：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的民权独裁"。如果真正像陳独秀或者托洛茨基的說法：承認中国資產階級得到完全的勝利，中国資本主义関係的發展程度，已經使農民分化到如此的地步，甚至中農群众已經動搖，那么：第一，帝国主义真正能夠使中国工業化，甚至於非殖民地化(!)第二，共產党应當準備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領導"農民"实行民生主义的革命，"工農民权独裁的口号，根本就应當抛棄。

事实上是，中国的資產階级民权革命沒有完结，農民的總的民权主义襲擊，不但必定要發動，而且已經開始，不过他的形式，是継續那"長期的遊擊战爭，夾雜的逐着逐、多的兵士暴動的爆發"。無產階级的任務就是团結自己的力量，堅強自己的党，發動群众的鬥爭，——以領導這個農战爭；工農的联合現在有更高階段的義意；"資產階級民权派内部的分别，就是用暴動問題做標準。誰贊成暴動，無產階级就同着他一塊去打"，虽然还"各自分路走"（列寧集，卷七上冊，第七十九頁）。

# # #

取消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見解，當然和這个不同。他們所要联合的標準：是誰能給些自由，誰能給些"合法群众"——因為他們自己，很久就很想把中国共產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線，解釋成為純粹退守的政策，解釋成為取消準備武裝暴動的總方針。

取消派說：中国的政权已經是資產階級的了。所以工人应当組織，只要組織，組織起来不是"等待"革命，本来也不是為着革命而組織，而是去做合法運動去参加"反对誤国"運動——同時也是去参加反对苏联的強硬政策，這種政策也是要引起国际战爭，把中国当做战場

和砲灰，弄成"亚洲的塞尔維亚"！（看独秀的第一二封信）

机会主义派說：取消派講得不太对——政权还不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正在為着自己的政权而企圖实行拿破崙主义呢，或者說，資產就等於地主，地主也差不多等於資產階級，他們沒有分別，所以地主有了政权，資產階級自然也可以称有了政权；只是有許多軍閥政客的各派各系，正在衝突。工人只要利用封建軍閥和民权資產階級的矛盾，或者"地主或資產階級"內部各派各系的衝突自己擴大些組織，做些運動，得到自由权，就足夠了。

他們兩派，都只看着"上層"，而不看見"下層"。其实，一方面幾十個蔣介石馮玉祥正是撕打，或幾百個汪精衛陳公博終在唉声嘆氣，或者搖旗吶喊；別方面就有幾万々小資產階級（農民）群众和一切所謂"小百姓"正在不可形容的受着極嚴重的压迫；而無產階級更是首先當着恐怖政策的鋒頭，可是亦就首先有能力領導這幾万々人起来。這幾百万和幾万々的人，"也是"政权的一個来源吧！——這就是工農民权独裁呵。

机会主义派不敢公開的說：中国民权革命已經完結，讓我們開始合法主义的鬥爭罷。他們却不肯相信第六次大会說："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充滿着懷疑和猶豫。他們就設法各方面的各種論調的来証明資產階級力量的偉大——或者說"穩定"，或者說"經濟不穩定"而"政治穩定"或者"不會有战爭"，或者"有了战爭未必有革命高潮"，並且設法估量革命力量的薄弱，說"党的幹部已經完全喪失"，或者"新的幹部都沒有經驗"，或者"舊的幹部理論上实際上都已经破產"，或者"工農團体完全沒有群众"，所以革命高潮一定要遲延"。固然廣州暴動失敗之後，革命势力受着極大的

摧殘——革命的前一高潮是中断了。須要克服盲動主义，須要做極艱巨的組織工作，須要有系統的去爭取群众，而準備武裝暴動，方才能夠趕得上必然要快到来的新高潮。但是机会主义者不懂得：游擊战爭裡盲動主义的病根，对於現在中国并不是游擊暴動本身不好，而正是因為沒有規去準備暴動不好。因此，机會主义者往々要求"有計劃的行動""有計畫的組織"進行合法主义的職工運動的經濟主義和鄉村運動的"和平發展"。所以他們往々批評政治示威和農民战爭說：這只是"自由暴發的野蛮政策"。

可是，中国共產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線——爭取群众，却是為着"準備自己，準備群众去实現更有計劃的更有联繫的更加進攻的總暴動"[列寧]——這是為着這個而有一者教者由苏維埃的可能前途的指出，這種前途現時是日益接近於实現了。

中国無產階級是在世界革命的先鋒隊伍裡面，帝国主义經过国民党而進攻苏联，使我们先鋒隊的任務更加加重了。同時中国統治階級内部的崩潰混战和工農革命運動的生長，明顯的把中国無產階級當前的任務，指示出来：堅強自己的布尔塞維克的党，組織團結自己的力量，領導正在興起的農民战爭，反对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民族改良主义——準備群众去实行有計規劃的進攻的總暴動，"变軍閥混战為階級的国内战爭，為武裝擁護苏联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爭"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对華統治和地主資產階級联盟的国民党統治，而建立工農民权独裁的苏維埃，以為社会主义而鬥爭。

無產階級政党是這個艱巨鬥爭的唯一領導者。凡是妨碍這種鬥爭的，例如右傾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都應當完全立刻肅清。党内民权主义和集中制的鉄的

紀律，應當堅決的執行，這都是為當強固布尔塞維克的党，加強他的战鬥力的，這不是為着取消派的"自由討論"而设的。取消派要自由，最好是到党外去自由，或者到自由派的資產階级那裡去，那才是適當的地方呢。一切主張党内無原則的，容忍調和的論調，除非是替取消派和机会主義派实行缓兵之計。所以党内机会主义的懷疑派，悲观，失望頽廢，以及一切机会主义的動搖和傾向，搖擺於取消派與开產党之间，实在形成現在最主要的危險，中国的开產党必須堅决实行反对這些右傾的鬥爭，絶無調和的餘地。

十一月六日　　秋白

Первое письмо Чен-Ду-Сю.

陳獨秀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

中央常委同志們！

現在関於時局之當面的危機，無过於中東路問題，這一問題不是簡单的中俄兩国間的糾紛，而是国際糾紛問題之導火線。由這導火線而至爆発战爭，也許是慢性的（因為中俄都不利於輕率開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間都還未曾充分準備好，現在誰都不敢断然取独佔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線的鬥爭。），然除了恢復中東路原有的状態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糾紛是要継續発展的。

這種糾紛發展到爆発战爭，有兩个可能形勢：一是苏俄始終取強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進攻，不但在遠東，近東也是一樣；一是苏俄若取退讓政策，帝国主义者間必然因互奪中東路遲早要導入第二次大战。無論是那一種，都要在中国做战場，把中国做成塞爾維亞，在战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着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騙民衆，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群衆，甚至有許多劳動群衆也受了欺騙，或者在受了欺騙而迷惑的嚴重空氣之下，不敢别持異议，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此事在中国発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関係，民衆多数心理又是怎樣，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衆同情，這些实际情形，都不能讓我們閉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進的。

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的宣傳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樣簡单，即是說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

不能夠解答群衆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問題。因此我覺得我們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群衆了，也太单調了，对於中東路收回這一具体問題，沒有正確的解釋（『苏联在中国的权利，僅只是在中東路沒有完全放棄，唯一原因是因為中東路是進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軍事根拠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這句話，顯然有幾曾語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発点，拿『反对進攻苏联』『擁護苏联』做動員群衆的中心口號；而未曾詳細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東路是怎樣的一个幻想，而且這一幻想必然釀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災难。此時中国大多数民衆，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這一層必須向他們解釋清楚，使他們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們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東路，在此時的確是有害無利的幻想，他們才能夠瞭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夠瞭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夠瞭解苏俄是被壓迫民族联合战線的領導者。離開具体問題說教式的单調宣傳，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衆，反而使群衆誤会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並且使国民黨很便當的簡单明瞭的把他們『擁護中国』的口號和我們『擁護苏俄』的口號对立起来，聽群衆自己選擇一個。

帝国主义間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場，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進攻苏俄所加於中国民族的災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識的人，一經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瞭解；而且只有這樣的宣傳，才能夠把国民党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後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於中東路的賣国政策或『誤国政策』（這个名詞更能使群衆親切的瞭解），然後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藉中東路問題向苏联進攻的

陰謀，才能夠得到廣大民衆的同情。

第四十二號中央通告說：『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帝国工人階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樣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這只是在客观上也許会演成事实，但我們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動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當極力動員群衆反对帝国主义進攻苏联的緊急關頭，决不應該向同志這樣宣傳，使同志們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来帝国主义進攻苏联還有這些好处，我們讓他趕快向苏联進攻罷！』因此；我主張中央趕快補発一通告，取銷這幾句話。

我估料現在的情形和從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発言引起大衆的誤会與揣測，所以我以後对於重要問題，都想有点意見貢獻於党；并且希望能夠把我的意見全文都在党報上発表出来。此致

革命的敬禮！

獨秀

七月二十八日

B454

Ответ ЦК.ККП. на первое письмо.

中央委員会的第一答覆

獨秀同志：

讀了你二十八日關於中東路問題的意見以後，覺得不只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

一，中東路問題很明顯的是反映着現在世界的苏联社会主义與其他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全世界資產階级对無產階级的殘酷的鬥爭，帝国主义有計劃的進攻

苏联的表现。如果認為這是『中俄兩国間的糾紛』，或者是『国际糾紛問題』，這就離開了階級的观點，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資產階級的国家观點。

中東路問題既然是由於帝国主义與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所以這一事变发生的前途，將是帝国主义進攻苏联战爭的爆发；固然帝国主义間因爭奪中東路引起了相互的矛盾，障礙着他們馬上对苏联的武裝攻擊，但是他們在苏联对付的一致的目標之下，仍然要企圖以共管中東路以及其他的方法来暫時彙調協這一矛盾。所以中東路問題最危險的前途是帝国主义進攻苏联的战爭，如果解釋中東路事件而把帝国主义進攻苏联战爭和帝国主义間的战爭的兩个前途平列起来，不只是迷乱了群衆对於主要危險的認識，而且這一分析的根本上就是離開了階級观點得出来的結論。

帝国主义相互間的战爭與帝国主义進攻苏联的战爭，雖然都是反革命的性質，但是他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帝国主义战爭是反革命勢力内部的战爭，帝國主义進攻苏联是反革命勢力進攻革命勢力的战爭，我們須公開的明白的把這一分別告訴廣大群衆，然後群衆才能知道对付這樣兩種不同的战爭的不同的策略。如果只是說『不管那一種，中国人都要受着直接的蹂躪』，那麼，群衆將要走向小資產階級和平主义的影响之下，盲目的反对战爭，就会說『国民党和苏联都要不得，造出战爭来蹂躪我們，雙方都要打倒』。国民党等上来一个欺騙宣傳，造一个假電報說『苏俄先開砲，战爭的災禍應該是苏俄負責』，馬上可以把群衆轉移到仇視苏联。所以這樣的分析就可以成為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义理論的基礎。結果便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與国民党的宣傳。

二，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是被帝国主义壓迫的民族，我們目前的任務與廣大群衆的要求，都是為着從

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不是对立的，矛盾的，而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一方面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广大群众很容易认识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而且可以进一步的认识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投降到帝国主义的方面，决不是为了中国民族的解放，而只是为着自己剥削劳苦群众的利益，牺牲民族的利益。国民党虽然极力宣传他的虚伪的民族主义，拿出『拥护中国』与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企图欺骗广大的群众，但是，只要我们能坚决的指出这个口号的真实的意义和利益，广大的群众很快的可以答覆他：『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

你以为这种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的口号，广大群众不只是听到了共产党的宣传，而且在过去革命时期（当然有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者除外）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中国大革命决不是空过了的，他的确训练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认识，只要我们的宣传能够深入，是不难揭破国民党的欺骗的。现在广大群众还没有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积极起行动起来的原因，固然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主要的还是白色恐怖的镇压与我们的宣传还没有十分深入。

就是中国群众真正如你所想像的这样落后，我们亦不应掩蔽正确的观点，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尤其不应该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因为这样不只是不能取得群众领导群众，而且要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宣传的扩大。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公开的揭出真理，耐心的向群众解释，广大的群众

545

必然在自己的鬥爭中得到證明，而一天一天的團結到我們口號的周圍。如果避免『擁護苏联』的宣傳，首先我們自己就成了資產階級的俘虜，更無法使廣大群衆来了解這一真理！所以中央在宣言上這樣的指出是毫無疑義的正確的。

你所提議的『反对國民党政府对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的口號，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左派在野党（如改組派，第三党）的口號，這一口號的意義就是說『你們收回中東路的政策定要引起世界大战，要使中國受到更大的損害』。在朝党蔣介石会馬上答覆說：『不会的，我們有世界列强的援助，苏联決不敢開战，列强因為苏联赤色帝国主義的敵視，他們也不敢自己打起来，我們便可以操縱其間，取得中東路的实际的利益』。這樣便使廣大群衆对於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实际利益的觀点完全模糊了。就是單純的提出『反对賣國』的口號也還是使群衆模糊，國民党還可以用詭辯狡詐的方法来欺騙群衆，一定要明顯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利益，才能使國民党無法狡賴，使廣大群衆的認識不致模糊。

三，中央四十二號通告中指出『帝國主義進攻苏联战争，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發……』這是『必然』的，而不是『也許』。我們必須把這一前途明顯的告訴群衆，才更能使群衆瞭解苏联的勢力是建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压迫民族的基礎上，在反苏联战争的時候，一定要堅決的起来與反革命勢力決鬥，才更能堅定群衆以國內战争来答覆帝國主義進攻苏联战争的決心。所以中央這一次的指出，也是毫無疑問的正確。

四，總觀来信的內容，似乎只是策略的討論，实际上是有極大的原則上不同，因為原則的錯誤所以發生策略上的不同。

中央热誠的希望這一解答的信到達以後，很快的得

到你取消這些觀点的申明.

中央始終是希望同志公開的發表对於政治对於党的意見，并且始終是極誠意的来討論同志們的意見，從沒有甚麼誤会猜測.尤其是每一個布爾塞維克的同志都不應恐怕他人的誤会猜測，而隱藏自己的意見。中央以布爾塞維克的热誠，準備接受你以後对於重要問題的意見。此致

布爾塞維克的敬禮

中央　八月三日

5454

Второе письмо Чен-Ду-Сю.

陳獨秀的第二封信

中央常委同志們：

讀了你们八月四日对於我論中東路問題宣傳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覺得你們对於我的意見根本不曾瞭解，因為是関係党的宣傳策略之重要問題，不得不再向你們剴切的重複說明一下，這是我对於党的責任。

我們要懂得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複雜的錯綜的全部理論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辯証法的時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資產階級的學者不懂得这個，所以往々拿他們自己的形式邏輯之《不容向位律》来攻擊馬克思和列寧，說他們是詭辯派；有些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因為不懂得这個，才把馬克思主義簡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討論党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对於中東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傳方法；並且不是替党起草関於这一問題的全部宣傳大綱，也不是討論中央对於这一宣傳原則，而是特別指出其中関於宣傳方法的缺点；此外你們已有的話，当然不用再重複加上一些贅詞了。你們对於我的前信不瞭解，有許多是由於这一点。

原則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謂之原則；至於策畧战略，則因有複雜的空時性之不同，便不能時々事々都必須照着原則機械的死板的應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時因為在時空性上有需要經过曲線才能達到革命之目的。竟可採用和原則形式不同的策畧。我們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責備列寧布勒斯特和約的政策，是《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問題》，是《因為原則的錯誤，所以発生策畧上的不同》；因為布勒斯特和約这一政策，在形式上顯然違背了《不和資本帝国主義妥協》的原則。像這一類的

《示简》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论证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雞尚能跳出人畫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是拿幾個原則甚至幾個名詞，以為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布尔塞维克主義，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布尔塞维克主義，這就未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布尔塞维克主義看得太淺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畧和原則混為一談，這不是偶然的錯誤，乃是《你们的原則》之錯誤。你们的原則，是原則和策畧不分，以為策畧必須是原則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傳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幾個原則機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義鑿斬，而不知道对於各種各樣複雜的問題有時间空间性不同的活的策略運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

在原則上，《擁護苏联》這一口号，不僅是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這一口号的宣傳；反之，我却以為我们以前宣傳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战略上，这一口号應用到夾有民族問題的中東路这個特殊事件，為爭取廣大群衆計，便要小心，单是這個口号便不夠了。並不是說对群衆解釋因收為中東路而必然発生的危險和国民党的賣国政策之後，而不歸結到反对帝国主義進攻苏联和擁護苏联，而是說必須对中東路問題本身有了正確的詳細的解釋，把国民党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後我们的口号才能発生比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說：《对於中東收回这一具体問題沒有正確的解釋，[只是]拿擁護苏联做動員羣衆的中心口号》，則《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份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羣衆》；这是因為有許多羣衆還在小資產階級民族偏見和国民党的欺騙迷惑之下，沒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於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向群众宣传，对於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麽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念模糊了；並且你们很肯定的说：《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瞭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说过：《落後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熱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後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後，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於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裏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与以特别的诚心和注意。》（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瞭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後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夠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後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並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後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少诚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夠争取群众，而是脱离了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党，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個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於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见得这是《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

法未取得群衆》呢？又怎見得反对帝国主義進攻苏联的战争，同時也反对帝国主義之间的战争，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呢？前一個是反革命勢力对革命勢力的战争，後一個雙方都是反革命者犧牲下層群衆為上層階級爭权利的战争，我们能不反对那一個？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論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若應同時反对兩種战争，群衆对於帝国主義進攻苏联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義的国家当做兩個交战團体，平等看待，《雙方都要打倒》；則当然應該如你们所說：《帝国主義战争是反革命的勢力内部战争，帝国主義進攻苏联是反革命勢力進攻革命勢力的战争，我们須公開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訴廣大群衆，然後群衆才能知道对付這樣兩種不同的战争之不同的策畧》；如此，群衆还何至誤会。并且，我还要問：《反对帝国主義進攻苏联的战爭》這一口号，其涵義是些什麽？為什麽不說《反对俄日战爭》或《反对俄美俄英战爭》，而說《反对帝国主義進攻苏俄》，这是否已經明白表示对兩方的敵每友的態度？《反对帝国主義進攻苏俄的战爭》和《反对英美战爭或日美战爭》，已有顯然不同的意義；何况还有在這些口號之下不同的詳細宣傳，何至使群衆誤会？

单就資本帝国主義的国家向無產階級的苏联進攻这一点說，不但在本質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顯的是階級衝突，这是任何同志都需解釋而能夠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釋的話再向中央解釋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話說。目的是在說明由中東路問題將引起各種可能的糾紛之總的前途，而不是說明其性質。我所以要說明各種可能的糾紛之總的前途，是因為我对於中東路問題的発生原因及発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像你们主观上的那樣簡单。美国对於北滿的野心，有把

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历史，过来正在企图以共管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此时留在苏联手里对於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復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個帝国主义对於此路的竞爭，必日益加剧，虽然他们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现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間尤其是英美两個领袖的帝国主义之间，由他们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爭，和他们向苏联进攻的战爭，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種战爭那一種先行实现，誰也不能机械的肯定像你们肯定将来战爭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於这两種战爭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問题的时空性而論，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該告訴群眾，同時帝国主义之间因互夺中东路而战爭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訴群眾；这是因為：第一，若是我们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轉变，群眾所眼見的战爭，不是向苏联进攻而是帝国主义互鬥，他们不是感觉到我们的指導不正確或欺騙了他们，便是以為帝国主义的互鬥於中国人沒有什麽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會因互夺中东路而战爭的危险，不但沒有迷乱群眾对於进攻苏联危险的認識，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不在此，这裏可不必說），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卖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證。

你们以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誤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那末，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也攻擊国民党《卖国外交》及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嗎？绝对不是的；因為我们党的政策是站在無产阶级立場，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話来指摘党離開了阶级的观点。所謂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衛等，也会攻

B454

樣的話攻擊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問：他们现的政策是些什麽？他们用这样的話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護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達到動員群衆反对進攻苏联拥護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樣的目的，他们已经離开了資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着這樣左的資產階級。我们不能贊成無政府主義的意見，以為現在的無產階級字典上已经不應有《国际》《国家》這類的字。有用这類字的人，《就是離开了階級的观点》，《就是資產階級的国家观点》。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曾大聲攻擊沙皇及克倫斯基政府因战爭《把国家及資本主義弄到未曾有的荒廢》。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寧这句話有战畧上複雜的時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階級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類廣泛的宣傳，才能動員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群衆，来擁護無產階級革命。），也会明辨証識他是降低了口号，是国家主義的观点，并且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或者你们以為这種資產階級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義之间的战爭時，無產階級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義对苏联战爭時，我们便只能用擁護苏联的口號。其实如果我们認定某一口号應該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完全是為他们階級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義战爭中我们也不能用；至於在帝国主義進攻苏联战爭中，也不能說《只能》用擁護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不是在原則上对不对的問題，而是在策略上夠不夠的問題。《只是》这一口号，实际應用起来到底夠不夠，最近幾次我们號召的示威運動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誇大的言詞欺騙同志了；你们如果仍不覺悟，老是拿誇大的言詞欺騙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騙就生反感，則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欺騙，以為我们已经有如何如何的力量，則去刻苦工作爭取群衆的精神日遠，这也不是個小小的問題；至於你们把群衆没有

在你们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错误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於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於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係，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後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为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只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後的群众，明白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筑最前途的估计；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绝非时空性所许。

前信所谓《因我的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怕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複杂了，为使同志们明瞭我主要

的意思起見，再簡单的重說幾句，做一个總結，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陳述関於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之全部內容，也不是討論此次宣傳的原則問題，而是覺得中央对於中東路问題的宣傳方法，在战略上有两個缺点：

（一）未曾用群眾所能瞭解的事实而不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論，对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釋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国民党所欺騙而接受我们的宣傳領導。

（二）《只是》擁護苏联這一口号与宣傳，在事实上只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战線之外了。

我為什麽要提出这两点，因為我们的党應該是实际鬥爭的党，不能忽視下列的各实际問題：

一，每個原則是否都可以机械的應用，不許有策畧上的变化？

二，中国此時是否有許多群眾还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偏見和国民党的欺騙宣傳之下，沒有解放出来。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傳上（関於中東路問題的），除了勾結帝国主義進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說到他这樣反革命的政策，对於中国有怎樣的結果？

四，中国的廣大群眾是否都已認識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五，对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確的詳細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眾所能親切瞭解的解釋？

六，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群眾，是否都能夠無條件的接受我们階級的口号？

七，对於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我们應否一概不要？

八，除階級的口号之外，是否还應該用其他廣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夠喚起廣大群衆，參加反对進攻蘇联的鬥爭？

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幾天論党内各種問題的那封長信，都能早日在紅旗上登出。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 八月十一日

Ответ ЦК. ККП на второе письмо.

中央委員會的第二答覆

陳独秀对於中東路問題意見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看了独秀同志解釋他的观点的第二封信以後，覺得他只是对於自己錯誤观点的文飾，並沒有接受中央正確的批評，而改正他自己的錯誤。雖然他聲明与中央沒有原則上的不同，中央提出《擁護苏联》的口号在原則上是对的；雖然把他在第一次信中提出的，認為《更能使群衆親切瞭解》的，《誤国政策》的口号，很巧妙的，狡猾的，敷衍过去了，实际上完全是辯護他原有的錯誤观点。中央認為这一錯誤观点，是極有害於革命的鬥爭，有害於党对於中東路問題的整个的路線，必須給以嚴厲的批評，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確的瞭解。

一，中央分析中東路問題，從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各種根本矛盾，与帝国主義企圖首先消滅苏联与鎮壓殖民地的革命的观点出發，指出中東路是帝国主義有計劃的進攻苏联鎮壓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表現，当然他們內部还包含了互相爭奪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進攻苏联的战爭仍然是目前中東路問題的主要的危險。独秀同志分析中東路問題，認為《不只是簡单的中俄兩国间的糾紛，而且是国际糾紛問題的導火線》，因此在前途上有兩種可能的形勢：《一是帝国主義助中国名義之下共同向苏联進攻；一是苏联若取退讓的政策，帝国主義必然互相爭奪中東路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央認中東路問題的前途，帝国主義進攻苏联战爭是主要的危險。而独秀同志看帝国主義進攻苏联战爭与帝国主義间相互的战爭是兩種可能的平列的前途，这是原則上的第一個不同。中央認識了現在世界總的形勢，進攻苏联战爭，与帝国主義間的战爭都同樣緊張起来，但是在中東路

問題上是有帝国主義主观上進攻苏联的作用，所以指出中東路問題主要的危險是進攻苏联的战爭，这正是馬克思的辯証的唯物論的分析方法。而独秀同志只認識了客观的總的形势，而忽視了帝国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主观的作用，所以把兩種战爭的危險平列起来，这不是十八世紀的机械的唯物論者的观点，而且根本上離開了階級的立場。譬如他說《日本覺着中東路落到苏国手裏，比暫時留在苏联手裏对於牠更是不利》这一句話意義的解釋，日本竟可以与苏联合起来对抗美国了，这裏面有一絲的階級观点沒有？

中央根據正確的分析得出来的主要的危險是帝国主義国民党進攻苏联的战爭，因此站在世界無產階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的观点上而提出《反对進攻苏联》与《擁護苏联》的口号。独秀同志根據他的观点得出来的主要危險是《战爭》，所謂《無論那一種战爭，都要在中国做战場，把中国做成塞尔維亞》，於是站在他的《擁護苏联》的观点上而提出《反对国民党对於中東路的《誤国政策》的口号，这是第二個原則上的不同点。

他說《在原則上……不但不反对擁護苏联的口号，而且以前我们宣傳这一口号太不充分，不过在含有民族問題的中東路这個特殊事件便要小心些。单只这一口号便不夠了》，似乎中央指摘他反对《擁護苏联》的口号的錯誤，是造謠寃枉他一樣。試看他第一信上的說話，到底是不是寃枉他？

《帝国主義向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場，或是帝国主義利用中国進攻苏俄附加於中国民族的災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識的人，一經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瞭解；而且只有这樣的宣傳，才能夠把国民党擁護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後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於中東路的賣国政策或

6454

《誤国政策》（这個名詞更能使群衆親切的瞭解），然後提出反对帝国主義利用国民党，藉中東路問題向苏联進攻的陰謀，才能夠得到廣大民衆的同情。》。

在这一段話上面，最後的一個《然後》，还沒有《擁護苏联》的口号，很明顯的不要《擁護苏联》的口号就令他还有一個《然後》（然後提出擁護苏联）沒有說出来，也是只有到了將来第三個《然後》的時候才能提出《擁護苏联》，現在是不應該提《擁護苏联》，很明顯的現在是要把他的《誤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擁護苏联》的口号。这就充分證明他用《只是》兩字来掩盖他自己的原則上的錯誤觀点只是一種狡辯，完全不是布尔塞維克公開的承認錯誤，自己批評自己的精神。

二，《擁護苏联》，在原則上既然是正確的了那麽，我们在策略上是不是要明顯的提出这樣的口号？独秀同志的意見以為《有時因為時空性上有需要經过曲線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竟可採用和原則形勢不同的策略》，因此他主張对中東路問題的策略《首先指出……然後……然後……然後提出《擁護苏联》（第一信的原文上是沒有的，依據他的第二信的解釋，替他補充上去）。這樣的《曲線》論，真是与列寧批評少数派製得以前經濟派策畧过程的《階級論》毫無二致。

《臨時大会派（即少数派）現在观察革命問題，与以前經濟派觀察八小時工作時间制問題所特的態度，毫無二致，（一）十小時工作時间制，（二）九小時工作時间制，（三）八小時工作時间制，從这種策略的过程，後来得到这麽樣的結果，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裡用不着細說。現在的臨時大会派，却也向我们提議，把今後的革命，好多的分成階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机関，（二）这個代表机関在民衆威迫之下決定組織立憲大会，（三）……関於

第三階段孟塞维克也許还未商量妥当》。（列寧兩個策略）

現在我们独秀同志对於中東路問題也向我們提議，（一）指出战爭的危險，（二）反对国民党誤国政策，（三）反对帝国主義国民党進攻苏联，（四）……関於第四階段是不是《擁護苏联》，我们的独秀同志或許也还未考慮妥当。这是与先宣傳，後組織，然後鬥爭，暴動，一個模型製造出来的机械的階段論，或者《曲線論》的少数派的観念。

凡一個政党的策略，即是这一個政党的政治行為，或其政治動作的性質，趨向及方法。决定一個策略，即所以確定党的政治行為．嚴格的規定整個党对於新党生的職任，或新的政治状況的態度》（列寧：兩個策略）

所以党对於某一問題的策略，必須与党对这一問題的職任和態度相適合，固然列寧主義的策略，應当是能適應环境，伸縮自由的，可是這種伸縮自由的性質，决不可以与党对於本問題的職任和態度相違反或《不同》，这是决定策略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列寧主義的每一個策略都是為着取得廣大群衆（本階級的和客観上的同盟者）的擁護，動員廣大群衆向統治階級進攻，可是無論甚麽時候，甚麽形式裏，这一策略的提出都要能提高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提高一般群衆的認識到無産階級的水平線。决不能為着取得廣大群衆，而降低無産階級的意識到一般落後的水平線。如果这樣便不是取得群衆，便不是領導群衆，而是跟着落後群衆的意識跑，做群衆的尾巴，这是决定策略的第二個基本條件。如果不注意这些條件，那麽就会喪失策略上的革命性和階級性；因此一方面会発生左傾的幼稚病，别方面会発生策略上的机会主義，妥協主義，以致於背叛革命。

現在党内对中东路问题的两個極端的偏向，自然都是原則上的錯誤，同時也都是不瞭解这些决定的條件。托洛斯基主義者不認識这些條件，走到極左方面，只提出《為世界革命而擁護苏联》的口号，《為中国民族解放而擁護苏联》的口号。我们的独志因為不瞭解这些條件，走到極右的机会主義方面張不要，或暫時不要《擁護苏联》的口号，而提出資產階級左派的《反对誤国政策》的口号。

独秀同志不瞭解策略上的妥協与降低無產階級政治口号是絕对不同的；為着革命的階級策略的利益暫時取某種的讓步。这是合於列寧主義的原則。但降低無產階級政治的口号，这是列寧不止一次的毫不客的指什少数派这样的机会主義。独秀同志因為不瞭一点，附以拿到离对布勒斯特和约的讓步，来證实机会主義的策略的《曲線論》。為甚麼独秀同志不瞭解当時列寧雖然暫時对德帝国主義讓步，但是也沒有降低当時《無產階級專政》的口号，而且相。列寧正是為着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而暫時讓步。秀同志拿到离对布勒斯特和约的暫時的讓步，来掩的降低無產階級的政治口号的机会主義的錯誤，充明他对於列寧主義的誤解。

三，《反对国民党誤国政策》与擁護帮助民族的苏联》，表面上都是站在民族观点上的口号，实一個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号。一個是無產階級的革口号。現在的《国》是豪紳資產階級的《国》而不是国大多数民衆的《国》。無產階級認為必須推翻現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国》，建立大多數民衆（工農群衆）的《国》，然後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澈底的解放附以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主張，驅逐帝国主義必須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联系起来。資產階級左派的

是要擁護現在他们階級統治的《国》，但是不滿意現在統治的派別，所以常々攻擊現在的統治者《誤国》，或者是《遺誤党国》。（第三党常々罵蔣介石誤国，而改組派常々罵蔣介石遺誤党国，这是因為改組派是国民党的一派，而第三党却自以為是国民党々外的党。）無產階級應該堅决的反对統治階級為着階級的利益出賣整個民族利益（賣国），但是無論任何時候都不能走到承認現在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观点，而罵他们《誤国》。並且《賣国》是有必須絕对的反对的意義，而《誤国》，只是相对的攻擊的意義（就是还有改良的餘地）。所以《誤国》只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名詞，而《賣国》却是被压迫国家的無產階級站在擁護民族利益的观点時候，也可以應用。不过沒有說明的单純的提出《反对賣国》，还是可以使群衆糢糊。所以《誤国政策》与《擁護苏》》不止是形式上的不同，而且是根本政治意義的不同。

中央只指出《誤国政策》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号，並沒有說《賣国》也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名詞，独秀同志的第二次信上故意把《誤国》与賣国》联做一塊来說。在独秀同志的第一信上对於他的《得意之作》的《誤国政策》，特別注明《更能使群衆親切瞭解》，可見他特別重視这一口号，而在第二信上却不把《誤国》特別解釋，而只与賣国联做一塊囫圇吞棗的敷衍过去，这只是一種狡辯的把戲，而不是討論策略的正確的態度。

《〈擁護苏联〉的口号，不止是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来信上的話），中央特別注意現在是民族主義革命的階段，廣大群衆的烈强的民族观点，正是中国革命的一個偉大的動力，所以中央無論在宣言上，通告上，机関報的言論上，都特別着重解釋《擁護苏联》的口号在民族方面的意義。不过这樣是不夠的，一定要同時解釋这一口号在階級利益上的意義，

然後才能使廣大羣众瞭解，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利益，与無產階级解放的利益，不是不相衝突而且是不可分離的。独秀同志既然瞭解了《擁護苏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又讀过了中央的宣傳言，通告和各種刊物文件，却又攻擊中央只是站在階級利益上的宣傳对於群众的民族观念《缺少戒心和注意》，难道中央特别着重《擁護苏联》口号在民族方面的解釋，是没有《戒心和注意》，一定要墮落到資產階级观点的泥坑，提出《誤国政策》的口号，才算是有《戒心和注意》吗？难道要取得廣大的小資產階级群众不是要把这些群众的观念，提高到無產階级的水平線而是要跟着落後的群众的意識跑吗？独秀同志的中心錯誤就在这裏，他只知道《注意》一般群众的民族观念，而不知道要使廣大群众脫離資產階級歎騙的民族观念，提高到無產階级民族革命的思想的水平線。这只是对於群众的民族观念的懼怕，因此使自己墮落到資產階级的行列，而不是領導群众的民族观念去接近無產階级的民族革命的思想。懼怕群众的落後的观念因而自覺的或不自覺的使自己墮落到資產階级的泥坑，这是一切机会主義者的病根。

《擁護苏联》，無論在階级观点上，民族观点上，都是必須的口号，所以中央並没有不注意群众的民族观念。独秀同志却想取消《擁護苏联》的口号，拿《反对誤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他，正是独秀同志拋棄了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主義不要站在民族观点上的宣傳，独秀同志不要站在階级观点上的宣傳，在策略的意義上說，这正是机会主義的兩方面。

四，《群众对於政治的瞭解，主要是靠群众自己的政治経驗，单只我们的宣傳煽動是不夠的》（見列寧左派幼稚病）。苏联首先放棄在中国的特权，苏联在中国大革命中用盡一切力量帮助中国革命，帮助中国反抗帝

国主义，国民党一开始背叛革命，投降国帝主义，屠杀工农的时候，便实行与苏联绝交，这难道不是群众的政治经验，而是《主观的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的表现》吗？现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以至广东福建的农民群众说《苏联是打抱不平的》，这不是偶然的，正是群众在自己过去斗争的经验得来的认识。所谓《苏联是打抱不平的》，正是《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朋友》的意义。至於《误国政策》，只是字面上已经不是一般工农群众所能瞭解，而只是一般听惯了《遗误国党》的资产阶级的人们懂得，至於他的含义上要经过《曲线》的解释才到本题，更使一般工农工劳苦群众莫明其妙。一個是工农劳苦群众易为懂得的口号，一個是资产阶级的人们易为懂得的口号；一個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口号。一個是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口号，我们到底应该採用那一個？或者是不是两個可以同时并用？固然国民党正在极力扩大他的欺骗的民族宣传，想来模糊群众明确的认识，固然《现在广大的群众还有民族的偏看，国民党的宣传有很大的影响》这正是需要我们加倍的努力去扩大这一口号的宣传，使群众在过去斗争中有了这样认识的基础上更加明白起来。固然这一口号只能动员《革命的群众》，这正是需要我们自己並动员革命群众向落後群众去解释，吸引他们到革命的战线上来，决不应当採取落後群众的口号，而使革命群众堕落到落後群众的水平线。我们决定策略，提出口号，应当首先注意《革命的群众》，而不应当首先注意落後的群众，尤不应当只看见落後的群众而不看见革命的群众。中央注意了革命的群众，同时注意了落後的群众，所以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同时特别着重这一口号在民族方面的解释，独秀同志只看见落後的群众，而忘記了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的群众，所以主张取消《拥护苏联》的口号，而用他的资产阶级的左派的口

号《誤国政策》来代替，这就是中央与独秀同志的不同。

独秀同志在第二次信上不止一次的申明，《〈擁護苏联〉的口号，原则上是对的》，《我並不反对這一口号》，只是覺得这一口号不夠，同時要提出《誤国政策》的口号，才能使群衆親切瞭解。（同時又没有承認他在第一次信中不要《擁護苏联口号的錯誤，並且没有承認擁護苏联應該是中心口号。可見他是故意的糢糊同志的观念）固然党对某一問題的策略，為着要動員更廣大的群衆起見，除了根據党对这一問題的職任与態度提出中心口号在群衆中作廣大的宣傳外，同時还要提出許多群衆切身利害的附屬口号，来帮助这一中心口号更能深入群衆。但是这些附屬的口号，必須在政治意義上不与中心号相矛盾，或者是降低中心口号的意義。譬如号召五卅示威運動，《驅逐帝国主義》是我们中心口号之一，因此我们的附屬口號，提出《反对屠殺張学良》，《驅逐外国海陸軍》……等，因為这些口号与中心口号一点矛盾也没有，而且可以帮助中心口号更能深入群衆。可是决不能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来做附屬的口号，因為《修改不平等條約》是降低了《驅逐帝国主義》中心口号的政治意義。所以对中東路問題，中央提出《擁護苏联》的中心口号之外，同時提出《反对日本出兵滿洲，反对帝国主義共管中東路，反对資本家利用白俄压迫自来水工人……等（参閱中央通告），这些口号不但不与《擁護苏联》相矛盾，而且可以帮助《擁護苏联》口号的深入。假如提出反对国民党《誤国政策》来做附屬口号，便是很明顯的降低了中心口号《擁護苏联》的政治意義。所以把《誤国政策》与《擁護苏联》同時並用，也是一樣的錯誤。

独秀同志看見上海兩次的示威参加的群衆还不廣大，以為就証明了中央的《誇大》，就是中央策略錯誤的

结果。然则採用了《反对误国政策》的口号，就能动员群衆吗？果然这样，为什麽改组派第三党老早採用了这样的口号（請独秀同志去讀一讀中華革命党对中東路問題的宣言和改組派的机関報民主），並没有看見廣大的群衆在他们口号之下行動起来呢？不是的，实不是的，群衆瞭解了这一口号，还要加上群衆主观上鬥爭的勇氣和客观上统治口号之下積極的行動起来。現在廣大群衆其所以没有更能積極的為这一口号而鬥爭，就是因為現在群衆鬥爭的勇氣还没有高漲，和统治階級白色恐怖慘酷的鎮压，再加上我们的宣傳还没有十分深入的原因。譬如《打倒帝国主義》这一口号，独秀同志总不會否認是廣大群衆所不能瞭解的吧？為甚麽廣大群衆还没有為这一口号而鬥爭起来呢？是不是看見廣群衆还没有為这一口号来積極鬥爭，便怪疑是这一口号的錯誤，而主張拿出小資產階級更能懂得的《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口号来代替他呢？恐怕只有机会主義才是这樣想吧！假如有人說明，这不是策略的不对，而是客观的白色恐怖的压迫，群衆鬥爭的勇氣尚未高漲，和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十分深入的原因，便骂他是《机会主義者把自己主观上的錯誤，推倒客观上的老法子》，恐怕只有真正的机会主義者企图攻擊党的正確路線的時候，才会这樣的無的放矢吧！並且二十六和八一的兩次示威，都有千數以上和幾千群衆的參加，这種這不是建築在群衆的自覺上，而是党的命令主義命令来的嗎？难道不建築在群衆的自覺上，由党的命令可以使群衆赤手空拳的去与帝国主義統治階級的槍砲拼命嗎？只有机会主義者才是这樣的侮辱群衆，不相信群衆。至於說用我们的口舌去宣傳群衆，用群衆的行動去影响群衆，这就是《命令主義》；組織的鬥爭与示威游行就是《盲動主義》，無異乎說現在是研究的時候，《讓群衆起来再幹嗎！》这是不是十足的机

会主義？

五，独秀同志两次来信上，非階級観点的分析方法与他的机会主義的錯誤的主要点，在上面已経有充分的説明，至於他的来信上故意造謠斷章取義的対中央的攻撃（如説中央《只要站在階級利益的宣傳》，《只是為有害於無産階級的苏联而反対》）用不着詳駁事実来做反證，只要細閱中央一切的文件，便可知道。尤其是一些字句上的荒謬，更用不着逐字句的批評。但是他在来信上的最後歸納為八個問題，現在也把上面的意思歸納起来作一答覆。

1，每個原則，是否可以机械的應用，不許有策略上的変化？

一每一个策略必須与党従原則上決定的職任与態度相適合，雖然應該有伸縮的自由，但決不能与原則相違反或《不同》。与原則違反或《不同》的策略，尤其是与少数派的策略过程階級論一様的《曲線論》的策略，便是机会主義的観念。

二，中国此時是否有許多群衆还在小資産階級的民族偏見和国民党的欺騙宣傳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有。但是必須用無産階級的民族革命的口号才能使他们在這些《偏見》和《欺騙》之下解放出来，如果拿資産階級左派的口号，只能助長这些《偏見》和《欺騙》；並且这就是懼怕群衆的民族観念，而使自己墮落到資産階級的泥坑，正是机会主義的病根。

三，在反対国民党的宣傳上（関於中東路問題的）除了勾結帝国主義進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説到他这様的反革命（或許是誤国的誤寫罷？）的政策，対於中国有怎様的結果？

一定要有詳細的說明，但是主要要指出進攻苏联同時就是镇中国的革命，說明《战争》的危險还是次要点。尤其是把進攻苏联战争与帝国主義战争是中東路問題两個平列的可能前途，同時又不說明两個两爭的不同的意義，只是籠統的說《战争災禍来了》，这不只是迷乱了群衆对於主要危險的認識，而且可以做小資產階级的和平主義的理論基礎，甚至可以被資產階级利用去反对苏联。（参閱第三十七期中央答覆独秀同志的信）

4，中国廣大群衆是否都已經認識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凡参加过中国大革命鬥爭的群衆，的確在他们自己的政治經驗中，可以得到这樣的認識。但这並不是說已經不是資產階级的欺騙宣傳所能動摇，而不需要我们揭露資產階级欺騙的努力了。

五，对於中東路問題的本身，是否需要正確的詳細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衆所能親切瞭解的的解釋？

非常之需要，所以我们要着重在《擁護苏联》口号的民族革命方面的意義的解釋，群衆有了过去的政治經驗，很有可能親切瞭解这樣的意義，这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至於《誤国政策》的口号只有聽慣了《遺誤党国》的資產階级的人们所能瞭解。决不是工農勞苦群衆所能瞭解

六，無產階级以外的廣大群衆，是否都能夠無條件的接受我们階级的口号？

《擁護苏联》不只是階级的利益而且是民族的利益，所以不只是無產階级能接受，而且是一般群衆所能接受。

七，对於比較意識落後的群衆，我们應否一概

不要？

我们是要拿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口号去征取他，如果是去跟着他们的落後意識跑，便是变成了群衆的尾巴，而不是领导群衆。

八，除开阶级口号之外，是否还应該用其他廣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夠唤起廣大群衆参加反对進攻苏联的斗爭？

当然，除了中心口号之外，还要有許多使群众更感着切身利害的附屬口号去发動群衆。但是这些附屬的口号，决不能在政治的意義上与中心口号相矛盾，或者是降低中心口号的政治意義。《誤国政策》便是降低了《擁護苏联》口号的政治意義。

綫索上面的說明，很明顯的有兩個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中央站在階級的觀点分析中東路問題主要的危險是是国主義国民党進攻苏联的战爭，因此中央提出《擁護苏联》的口号，征取廣大的群衆到無產階級民族革命思想的水平線；独秀同志分析中東路問題，認為進攻苏联战爭与帝国主義战爭，是兩個水到的前途，又不明白向群衆指出兩個战爭的不同的意義而空喊《战爭災禍》，同時懼怕群衆的民族观念，因此提出《誤国政策》的口号，使無產階級政党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泥坑。很明顯的一個是列寧主義的路線。独秀同志站在他的机会主義的观点上，因此覺得中央的正確的路線是盲動主義。凡屬怪疑或不願意接受列寧主義的路線的，毫無疑問的不走入極左的幼稚病，便要走入更深的机会主義，这就是独秀同志直到現在还不能從机会主義的泥坑中脫離出来的原因，希望独秀同志对於这一点要有深刻的自覺。

中央常委同志們：

1，一九二五——二七革命之失敗，其主要原因，是党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這个錯誤的機會主義政策發生之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对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对於国民党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致不自覺的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我們若不深刻的瞭解這个根由，將仍要輾轉陷於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將只是口中反对機会主義這一名詞，而手中所做的仍舊是各種各樣變相的机會主義。

『八七』會議以後，僅僅是籠統的反對機會主義，并未曾指出機會主義政策發生之真正根由；更未 看清實際情形，勇敢的承認革命之失敗及資產階級之勝利這些既成的事實。廣州暴動失敗後，我们分明是失敗了，當時應該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階級的戦鬥力，即是我們從戦場上退出来，整理我們的隊伍，積聚我們的力量，以圖革命之再起。當時党的政策却不是這樣，反而是在主觀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漲，因此取了直接進攻政策，直到六次大會前尚在進行湘鄂贛三省總暴動，使敵人得着機會，用各个擊破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内，把我們整个的階級力量打得粉碎，無產階級及農民群眾，在党的『暴動！暴動！繼續暴動！』這樣命令之下，受了一時不能回復的損傷，党中最積極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盡，党和群众也斷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復。

當廣州暴動前後，我感覺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錯誤的估量，遂至有錯誤的政策，曾寫了幾封不避忌諱的信給中央， 出國民党政权决不會像你們所估計那樣快的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樣高昂，並且我們已失了和廣大群眾的聯系；若不馬上改變政策，從

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鬥爭中獲得廣大的群衆，若不估計群衆自發的革命鬥爭情形到了若何程度，而隨便暴動，其必然失敗的結果，只有使群衆更加離開我們，甚至於怨恨我們而接受反動派的宣傳。當時的中央对於我的意見，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當做笑話到處宣傳。聽說在六次大會時，特立对布哈林說：『盲動主義極盛時，我實覺得不妥當，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說出不同的意見』的確，當時的中央同志們，以為只有自己和與自己同一意見者才是真正布尔什維克主義，只有暴動才是布尔什維克的正確路線，如有人对於革命高潮有点懷疑，对暴動有点審慎，便要拿『機會主義的殘餘』『观念不正確』等罪名加以打擊，大有『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氣概。幸而六次大會对於盲動主義命令主義及革命高潮之盲動的肯定，和对於机會主義又一樣，加以相當的矯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這些錯誤之根由系統的澈底的指摘出來，遂至留下現在的禍胎。

2，現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經改正了這些錯誤呢？我以為一点也沒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動主義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時存在。始終不認識資產階級的發展对於革命之危險，始終不認識統治階級即国民党政权之階級性，始終不認識革命失敗與資產階級之勝利，始終不認識現在是列寧所謂『二革命二個波间過渡期』則在政治分析與估量上自然要發生錯誤。政治上有了錯誤的估量，即是把敵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壞，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発生盲動主義；盲動主義者碰着不動的阻碍，自然要発生命令主義；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殺党内德謨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見不同的份子，造成自己褊狹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証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來說』及盲動路綫之正確。有許多同志都感覺着

中央在政策上組織上或工作方法上，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我以為不是這樣零碎的問題，而是有系統的一貫的總的路綫之錯誤。若長此照這樣不正確的路綫繼幹下去，於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又只得不避忌諱，向你们詳細說明一下：

3，你们对於蔣桂戰爭性質分析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於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發展对於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不瞭解統治階級即国民党政權的階級性這種傳統的錯誤這種整个的錯誤观点所表示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種各階級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党，這本是我們党傳統的錯誤；由這傳統的錯誤观念做出發點，所以你們才把蔣桂战爭及一切國民党内部鬥爭，都當做兩個是对立的根本階級（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矛盾之爆発。（你们把蔣桂战爭看得如此嚴重，如此誇大，所以一直到战爭發展之前一分鐘，尚堅決的預言戰爭不會就爆発；這个錯誤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誇大，遂不得不代他们外交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長期的侵蝕，自国际資本侵入中国以後，資本主义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个的農民社会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济所支配，已顯然不能够以鄉村經济支配城市，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經济利益之根本矛盾　　頑主農奴制，实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早已成了牠们在經济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累）財政上的（維持政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税）共同比較；至於說資產階級企圖発展市场，列寧曾經告訴我們，這是要靠「農村資產階級之形成而発達，以二重方法創造市场：第一，為生產手段創造市場，即是由富農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農民身上搜集的生產手段轉化為資本；第二，由購買能力較强的農民消費擴大，以創造市場」。若改良一般農民生活，增高一般

這裡連工人也包含在内）購買能力，則非資本主義生產力終於不能有高度発展的中国資產階級所需要的與可能（国民党政府絲毫也没有想到怎樣解决土地問題，正因為現在没有這个需要與可能）。此外，這两个階級之「階級的經濟利益」根本矛盾，还有甚麼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七年之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未曾完成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牠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变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变，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对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義的讓步和帮助，增加了牠的階級力量力量之对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轉变時期中，受了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過程中，变成殘餘勢力之殘餘；牠為自存計，勢不得不。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牠们各个區域内的統治基礎。牠們所以現在尚能 存，乃因為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勢力的威嚇，不但不願意消滅封建勢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勢力妥協，来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為領導的統治者，并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你們忽視了這些很明顯的事實，遂至今還是過份估量封建勢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負責同志日前我和辯論關於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比重的问題時，竟說：「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像這樣不正確的觀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這两個对立的根本階級（封建與資本）战争之可能，自然會產生「每个战争都是階級战争」的理論。馬克思主义者只可說每个战争都有經濟的背景，在階級的社會裡，便有階級的意義（這裡所謂階級的意义，如就階級内部战争說，是和个人的意義及其他

意義相对立，不是和階級戰争之涵義完全相同；因為每个階級战争，必須是兩个对立的根本階級之革命战争）不能說每个戰争都是階級战争——兩个对立的根本階級战争。這是因為未有階級以前的原始民族 族已有战争；已有階級的社会裡，各階級內部也有战争，且最顯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軍閥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蔣桂战争真是兩个对立的根本階級戰争，蔣介石討伐桂系，如果真如你们所說是"為資X階級本身的發展"，而要"相當的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號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謂"更反動的"「尚有強固基礎」的封建勢力战争；那末，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还未完全喪失其革命性，我们便不應該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衆起來反对这種战争，因為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這些也都是群众要的。三十四號中央通告所謂：「同志中有以為「蔣桂战争是資產階級反对買办地主階級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勢力反對封建勢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因之這次戰争在客觀上是有革命的意義」。這是一个極端右傾的危險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擁護蔣介石的路綫上去」。這些同志对於蔣桂战争性質所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說的一樣，這一个極端右傾的危險观念與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錯誤的分析之必然的結論，如何能够歸咎於同志！於是你们又解釋道：「階級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許多同志都說中央有這樣的解釋）；如果真是這樣，則馬克思主义及無產階級战略基礎，便根本倒台！「每个战争都是階級战争」及「階級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這兩個理論，都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加了聞所未聞的修正，顯然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4，蔣，桂戰争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对於他

又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態度呢？我以中國的資產階級还正在很複雜的流变生長過程中，和歐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不同，牠们的階級来源太複雜，又加以帝國主義之操縱，牠們內部各派之間，政权及地盤之明爭暗鬥，以至爆发战爭，這是必然的現象，而且是較長期的現象，蔣桂战爭，不過是其中之一；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新政權之內部衝突，而和国民党從前对北方封建軍閥战爭有不同的性質。不但代表複雜的幼稚的中国資產階級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進的資產階級，牠們當中，工業資本和農資本，輕工業和重工業及財政資本之間，雖然很少国内战爭，而衝突仍然不斷，這一国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那一國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更有大的衝突。無產階級对於牠們的態度，只是分析牠们之間每个衝突为了經济上或政治上某種具体問題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他们之間每個衝突（不管牠是經济的或政治的），来擴大自己的運動，对於他们之間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戰爭（不管牠是大規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號召群衆起来反對，不但是消極的反对，且須積極的轉為階級鬥爭；此時不需要代他们分別那個是純資產階級的，那個是帶封建性的；或者那個較進步較左些，那個更反動些，那個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騙，那個連這些都沒有；因為這决不是我们的任務。我们當面的任務是推翻整個反革命勢力之統治，因為我们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立脚点上，对於牠们之间已經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牠们之間採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從前俄國的少数派；少数派總以為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立憲比代表封建勢力的沙皇進步些，沙皇更反動些，牠們之間的確還有衝突，無產階級就該和資產階級联盟掃除更反動更有强固基礎的封建勢力。　多數派堅决的回答說：否。

牠们对我们已经是整個的了，我們对牠们也必須整個的L我們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這是民主立憲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牠的应声蟲，多数派則断然拒絶之。L对桂战爭是反封建势力」，這是蔣介石爪牙的宣傳，　我们共產党中央也這樣說，這是何等痛心的事。

5 因為不曾痛察统治階級的階級性，不曾看出資產階級各方面的發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險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綱中，对于富農取了猶豫態度。列寧說：L農民社會之分解，是為資本主义創造国内市場」L農村資產階級之形成將發達，以二重方法創造市場」（富農中農及農業無產階級）富農是農村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在農村發展之初步形式，牠对于下層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資產階級取一致態度；　是因為富裕的農民，蓄有餘資，以营利為目的而購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較多的雇農，生產商品，出賣于市場；或于農業之外兼營商業；或放高利貸以至包耕包佃；牠已经走進剝削階級，和被剝削的下層群众（貧農）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經過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後，進了土地革命的階段，下層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債，農民反对革命是不会有絲毫猶豫的。

每個革命鬥爭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份必然因革命所給予的利益不同而發生向背；現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貧農（雇農，小佃農和小自耕農）是革命的柱石，中農是中間動搖分子，富農是反革命者，因為牠所失于革命的農民的東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終想和富農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終想和資產階級联盟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樣的机会主义。

并且中国的農民革命，不是簡單的反对封建地主問題，中国的地主階級中，根本就沒有像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時封建領主那一特权等級。商業資產階級，不但直接

剥削農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業資產階级，并且許多衰微的地主正因為商業資產階级及富農的兩種榨取，更要加緊剥削農民以自存。在壟断原料方面，城市商業買办階级，使農民経済陷于極困苦不自由的奴隸地位。富農佔有較多的土地剥削雇農；高利貸所剥削的，不用說多数是貧農，包佃者对農民所取租額，當然比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漁中取利。所以商業資產階级，買办階级及富農，和地主階级同樣是農民革命的对象。

6，最令人不解的，你們不但在階级比重上把封建勢力看做和資產階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強些，最後更進一步否認了中国資產階级之存在。你們從前肯定的說桂系和馮玉祥都不代表資產階级，隨後又說，「蔣介石並不等于資產階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紅旗）；那末現在中国統治階级性及其領導勢力是什麼呢？国民党政权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現的是什麼呢？中国的資產階级是不是直到現在还沒有他的政治代表？如說有，既非桂系，又非馮蔣，那末究竟是誰呢？如說沒有，那末，以前所謂「階级聯盟」，及所謂「資產階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謊，豈非滑稽之至！大約是你們看見代表資產階级的蔣介石並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農民生活，并且他战勝了桂系及而馮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減租，你們对他很失望，所以說他不等于資產階级。你們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說：「假如馮玉祥是代表民族階级勢力，必須解放農民等々」。如此說来所謂中国資產階级之存在，并不是現在实有的這些冒牌的假的資產階级，只有幻想着在你們頭腦中如此這般的資產階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資產階级，你們对于中国資產階级這樣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辯証法，在一切現象流发生長過程中，抓住現在实有的資產階级；而是依照形式邏輯，虛構一個超時间的性質一定模型的

資產階級。固际說你们「誇大資產階級」，正確点說，乃是对于資產階級的幻想。」

這樣的幻想，决不能够領導群众向當面的資產階級鬥爭，而是領導群眾去尋找你们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這般的資產階級，帶有革命性的資產階級，只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現在不但在中国找尋不着，即欧美各国也找尋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訓我們；資產階級抬頭，一看見下層階級有獨立的行動，馬上開始反動，毫不猶疑的和封建的舊勢力妥協，什麼無耻的反革命舉動都會做出來；這正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是歷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都是如此，經济文化落後国的中國資產階級更沒有例外。所以我們不能除開現有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即是除開馮蔣等派這些反動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另外幻想會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衛，陳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動的；我们对于整個的資產其各派代表不能有絲毫幻想，無形中帮助他们欺騙群衆。

了，不錯，你们着实做過反對資產階級的宣傳，可是你们說了千遍萬遍又反对資產階級的話，都被你们的幻想而錯誤的分析打銷了。這是因為你们对于資產階級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目的物（資產階級）從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们对于統治階級的階級性之錯誤的分析，又把群衆政治鬥爭的視綫混乱了。因此，群衆會向你們反問；誠然，應該反对資產階級；但是蔣介石既不等于資產階級，馮玉祥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桂系，閻錫山，張學良更不用說，那末，我們反对誰呢？我们的階級鬥爭，不是僅僅反对工廠主和公司老板们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說：你们以為資產階級还要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幹這事的人呢？更或者說：資產階級多少还有点這些企圖，雖然不澈底

，就比封建階級進步些，是否还要联合他，領導他，為实現這些企图而鬥爭呢？群衆只認識簡单明瞭的事实，对于許多「然而」「雖然」「可是」「但是」等妙曲折不捉摸的哲學，不大理會，你將怎樣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為你们的幻想與錯誤的分析，也會復活他們对于資產階級之幻想與希望，并且覺着更反動的封建階級尚有這樣的强固基礎，遂主推論到階級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論上現時仍有客觀的可能性，遂至懷疑工農单獨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務這一政策，失了理論的根據，莫非真是譚平山所謂「超時代的政策」。諸如此類的右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與錯誤的分析発生出来。

我们應該肯定的告訴党内党外的群衆：背叛革命後整個的国民党（從汪精衛到張學良，）政权，即資產階級為中心為領導的政权，已經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會肅清封建残餘，不会解放農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沒有　永遠不會有比国民党各派較革命的資產階級代表所能够完成這些任務；能够澈底完成這些任務的，只有列寧當年在俄国喊出「無產階級及農民的民主革命」。

8，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與宣傳，和盲動主義有直接的関係，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第一所謂革命高潮，乃是群衆的革命鬥爭逐漸發展滙合達到了最高点，而不是徒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徵象，必然是廣大群衆的（尤其是重要產業工人的）不斷的經济鬥爭，有轉向総的政治鬥爭的趨勢，决不能把斷斷續續的經济鬥爭，都當做革命高潮的徵象；至于因為資本進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衆鬥爭本身而言，統治階級之内訌及中間階級之動搖，只是帮助革命運動易進於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勢力是高潮，或低落，是党决

定政策時客觀的估量，而不是向群衆宣傳鼓動的口號：我們固然不能向群衆宣傳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衆宣傳什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衆以為在他們自身鬥爭之外，另外一個什麽革命高潮將從天上降下来幫助他們，一切問題都靜候牠来解決，因為牠就要快到来了。

說革命高潮將永遠不会到来，這種取消派的見解，自然是不正確；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并沒有也并不能把牠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足以消盡現實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說解決了民主革命的任務。從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〇五年革命，比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個不同点，決定俄国革命有再延之可能（見列寧俄国革命與無產階級的任務）；多數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〇五和德国的一八四八不同，而決定了俄国無產階級的战略．這都非常正確，在國际資本帝国主義宰制之下的中国資產階級，除了孫中山及其党徒的夢想，牠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之可能性，不但遠不及經過舉士馬克時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不及斯特黑姘時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當然有再来之可能，至於幾時到来，却沒人能够預言；只可說不會快要到来，因為現時群衆雖有些鬥爭，而拿牠當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徵還太不够。

現在是一種什麽時期呢？我們怎樣工作呢？前一個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後一個革命高潮還未到来，并且还沒有到来的徵象，現在還是兩個高潮間過渡時期，在這過渡時期中我們的政策我們的工作路綫，便應該和這个時期相適應，即列寧在一九〇八年所說的："過渡時期之特殊任務是準備力量集中力量"，我們要準備集中力量，首先要剷除盲動主義的精神，低下頭來設種種方法接近群衆，然後才說的上推動群衆向前鬥爭，由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我们只有"到群衆中去"才能够推動群衆；不應該決不能够站在群衆外邊，命令群衆，我們只有

在日常工作的努力，去推動群衆的實際鬥爭；不應該用臨時拉夫的方法，未製造群衆大鬥爭的空氣，我們的工作，應該切切实實推動群衆不斷的鬥爭在客觀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綫進行；不應誇大吹牛在主觀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綫進行，誇大吹牛，不但要助長同志們的盲動主義，同時也要助長他們輕視目常瑣細鬥爭的心理。一般的合法運動，自然是放棄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條件之下，為發展我們的力量有必要時，列寧所謂"不帶何等熱血性的一切合法手段"在這個時期也不應一概排棄，列寧在一九〇八年，此曾和多数派内排棄一切合法手段的"召還主義者"有過劇烈鬥爭。

當然群衆的力量只有在鬥爭中才能發展，并且群衆"自發的"鬥爭發展到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傾向，但這決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小数群衆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現下，或者喊幾聲我們發下的口號，可以冒充的，群衆上街示威，是一个很嚴肅的問題，我們每次號召群衆示威運動，也都要有嚴肅的精神與意義，不可常常隨便把他们領到街上玩弄；至根本就還沒有群衆，也要命令同志充當群衆出来做示威運動，以便証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說絶對正確，這種把戲更萬分玩不得的。這樣的玩弄，這樣的把戲誇大主義者（即盲動主義者）無可如何的這樣的最後的手段，決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決不能取得群衆，只有喪失群衆，決不能促進革命，只有斷送革命。

當然我們領導群衆做一切鬥爭，必須指出總的革命前途，不至使群衆感覺着一切鬥爭好像是盲行大海中絲毫也看不見彼岸的遠景。并且，中國革命也不是沒有很有希望的前途；牠就是群衆在不斷的鬥爭中積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裝暴動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國際帝

國主義之間劇烈衝突，國內統治階級內部不斷的沖突所加於中國各下層階級之榨取與痛苦及因此而發生絕大的經濟及財政恐慌等事情結合起來，那時廣大群衆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時我们的党在群衆中如有强固的領導力量，革命必然獲得勝利，簡单的急性的屢次預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屢次沒有到来，這種「打嗎啡針」的辦法，決不能使群衆明確的認識革命前途，其結果只有使群衆失望減少了革命情緒。

（9）盲動主義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運動中，盲動主義命令主義的归根性，由事前誇大的企图和事後誇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認識社会階级関係的轉变，不認識統治的階级性之轉变以为現在国内战争的性質和從前是一樣，統治階级將因之崩溃；不認識現在还是革命兩個波向过渡期，把群衆鬥爭程度誇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雖然经过六次大會以会不便公然說中国革命高潮仍但是一直高張，只好說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进察性更進一步，換一句更確定的話說：《革命復興》；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階级鬥爭与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現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時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樣錯誤的政治認識与誇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樣好的革命环境，自然應該《動》，一点也不《盲》從前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好誇大的人，永遠是盲動主義者，永遠自己不承認是盲動主義永遠不認識盲動主義，把他当做真正布尔什維克主義，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確路線。

你们在此次（五卅）運動前政治的估計，是統治階级動摇；然而经过蔣桂及蔣馮冲突後，他動摇了沒有？又說是改良派的勢力縮小了，然而对中東路事件各工会一致發反俄宣言，改派的勢力縮小沒有？又說是群衆自發的革命鬥爭之進展；然而為什麽你们还要委用那断然用不得的辦法，派幾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紗廠去強自開車呢？你们在此次運動中所取政策完全是從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貫的命令主義，可恨的只是这些自發的革命鬥爭已经進展的群众，在革命運動現在这樣緊張的時期》（江苏省委ㄉ員的話），不聽命令去革命！從前盲動主義極盛時，有人說：《中央罵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罵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罵支部不革命，支部去罵

誰呢？只得骂群衆不革命，》这樣的怪現象，現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多員因为工厥罢工办不到，遂通看下級党部命令罢工說：《在原則上必須罢工》这是什麽話?!你们老記了列寧《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識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遺教了嗎？你们不是根据群衆的鬥爭情緒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緒与意志。

（五卅）運動應該作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績無論如何都有相当的意義；这都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但根据你们盲動主義的精神，在事前誇大的全国和事後誇大的报告，都給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譏評。

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論，我们若有正確的估量（非誇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而可能的政策（非誇大的）群众鬥爭是能夠逐漸向展的我们和群众的関係也能逐漸恢復的；可是下級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实敵不过中央机関盲動政策之摧殘（例如郵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種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夠安心去努力工作！

10，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为求得多数意見之一致以発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護，僞飯，遺落，营私舞弊，粉飾太平，委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現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極端民主化）的名義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謨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並不是什麽相当縮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於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見一概不許開口，從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問題，都

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達机関"；这樣的办法，為了操一切使盲動的命令能夠順利的施行，自然覺得很方便，其如毀坏了党的組織與力量何！倘若說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謨克拉西势必縮小到連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連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無從談起，党的基礎組織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說什麼党已有相当的発展，还說什麼革命高潮革命复興！倘若說他們的观念都不正確，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們盲動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線若有小小的不正確或大大的不正確，則是否需要"自我批評呢"？

列寧說过；"我們的机関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爭論，寧可說為了說明現存之意見相差深刻到若何程度，為了爭論諸问題的全面討論，為了討論諸種見解之代表者等，陷于褊狭性之鬥爭，在每個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識的劳動者面前公然爭論，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見解，而缺乏公然的爭論，把関于真实問題之不同的意見隱秘的擱置起来是現代運動缺陷之一，火花発刊宣言）他又說过；一切團体員，选举代表者，同時独立的各自对團体全部利害的爭論題目，都有陳述意見的必要，民主的組織之党也沒有例外，徵求所有党員的意見，不能視為原則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場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規模的杯葛（Boycott）特殊政治的的行動》（一九〇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說过；《中央委員会知道党員大众之意識的意見，從而不盲目的指導大众，……》（同上）他又說过；"在我們的报紙上，努力給與於理論問題的論文佔了很多的篇幅；并且從同志們对於爭点無忌憚的発揮"（我們的綱領）

同志间関於理論上政策上意見不同的爭辯，是党的進步現象，决不是坏現象；反之，大家都沒有什么不同

的意見，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現，爭辯之結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為大众所公認；錯誤的意見，一經公開的被大众批駁下去，以後才不至隱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發作出來俄国布尔什維克党的理論，就是長期在过程的爭辯中生長出來的，我們同志政治水平線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見的相互爭辯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陳套語什么"程度不夠"做理由，以為必須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賜"他们发表意見的理由，你们主張，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員政治水平提高而擴大，党員政治水平低便要縮小，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们老是固執你们的褊狹性，而不顧及党内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蝎，而企圖用中央威权霸蠻的造成你们意見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的不在党報上公表出來，一聽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观念""非無產階級意識""观点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内容的抽象名詞来排斥他，或者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如"反对派""杜洛斯基派""某々派"等，来鎮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的或無意的阻住了党的進步。

公開的理論爭辯尚未被容許開始，你们突然發出"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這是因為少数派的階級联盟政策及经濟主义取消主义，一貫的推翻了馬克思主义無產階級的根本战畧，且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領導的統治，資產階級还是革命的，仍主張什么"四个階級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為資產階級的發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這班人不顧党内和平的鬥爭，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錯誤，我們可以用教育及爭辯方法来糾正，用不着小題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這種嚴重

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谟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了然事後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谟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敢勇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闲谈，他们都很悲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疏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样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衍的做着工作再谈，而没有一点奋斗精神，或者一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

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於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

，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働。天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便不能不承認，「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現在的办法，你们褊狭性一致的圍作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員都有政治自覚能够自動的奮鬥活跳有生氣的党在那裡?!

11，綜合上述的說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統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組織上一貫的錯誤路线，為改正这些錯誤之說的路線我現在提說幾個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問題，对于革命高潮問題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麽時期問題，对于富農政策問題，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確的决定，（二）在組織上儘可能的擴大党内需要的德謨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舉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員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評」的自由，各級党部同会有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員间政治上意見不同的爭辯准其在党报上発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緊急的問題：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討論，七次大会又不能即開，應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個問題提出于全党党員之间，要求每个党員都充分発表意見，儘可能的在党报上継続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見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確路线，必如是才能統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喚起全党党員对于工作自動的努力，对于鉄的党紀自覚的服從；必如是才能使党復兴，使革命復興！

12，最後，我还要告訴你们；因為我不忍眼見無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樣長期的在不正確的路線之下，破滅銷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結論，寫这封信貢献於你们，希望你们稍为抑制自己的褊狹性，平心靜氣的把我的意見詳細審查一下；并希望把这

對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諸全党討論，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秀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ККП. об исключении Чен-Ду-Сю.

開除陳獨秀党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

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九年一一月一五日會議通過

中共党的六次大會在共產国際的直接指導之下，綜合全党同志的意見，依據歷年來鬥爭的教訓與国際革命運動的經驗，決定了党的布尔塞維克的路綫，一年来国内政治与共国際形勢的变遷，群衆革命鬥爭的開展，以及中央根據此路綫而執行的一切工作，都在实際上證明了六次大會路綫之正確，並得到全党同志的擁護。陳獨秀彭述之等在中央回国之初，即表現对六次大會决議的懷疑，对大會結果的不滿。中央當時曾对陳獨秀有过詳細的解釋与批評。

不僅在六次大會之後，更遠在《八七》會議時，當時的中央曾根據国際的决定，屢次要陳獨秀前往国際，討論中国革命問題。獨秀當時不僅不服從国際决定，且於同志間談話，表露其不滿意共產国際的意見。彭述之彼時在順直省委工作，亦曾有不滿意《八七》會議的宣傳。嗣六次大會召集，国際及中央要獨秀前往參加，且曾幾次催促，但都遭拒絕。六次大會中及大會後，国際又曾數電促獨秀赴莫。新中央繼續向獨秀解釋他赴莫之必要，但他初則應允，繼則取消，終則推延到明年開春。其实這都是他表面上的應付，他中心意見在他最後致中央的兩封信中，已完全表示他反国際反党反中央的一貫路綫出来了；他根本便不願赴莫去接受国際的訓練，他根本便無意誠去認識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時代之機會主义領導的錯誤。沒有决心去認識过去的真正錯誤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繼續过去的錯誤路綫，而墮入到更深的機

會主义。

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軍閥联合進攻蘇联，中央在此緊逼時期依據国際共中国党的六次大會决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進攻蘇联》與《擁護蘇联》的口号，動員全党同志，号召全国無產階級，農民與廣大勞苦群衆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與国民党軍閥。陳獨秀等不特不在中央的决定之下一致工作，並且離開中央的路綫，提議以《反对国民党誤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擁護蘇联》的口号，他在分析中東路問題之前途上，更認定《一是帝国主义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蘇联進攻，一是蘇联採取退讓政策，帝国主义必然互相爭奪中東路而爆発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見解的結論，除掉落後的群衆會主張蘇联退讓外，便祇會得出如獨秀致中央信中所說《無論那一種戰爭，都要在中国做戰場，把中国做成塞尔維亞》。於是我們祇要反对戰爭的禍害好了，不必去問戰爭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進攻蘇联，还是帝国主义自己互打，所以《誤国政策》的根本觀点，即是產生於此。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與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觀点和階級觀点絶对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衆中間散佈起小資產階級和平主义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資產階級左派的泥坑。他這種見解，完全表現他仍然固執自己过去的機會主义路綫，一点也没有接受六次大會的决議與精神。中央对於他的兩次来信，曾在理論與实際的各方面，指出他的機會主义路綫之危險，並告訴他在這樣革命鬥爭緊張的時期，必須放棄這種錯誤思想，回到党的路線之下来一致行動。

陳獨秀对於中央這樣的指示，完全拒絶，且更進一步提出與国際及中国党的六次大會根本不同的路綫，要求在党内公開討論。他認為过去大革命時代的機會主义錯誤，乃是《对於国民党的階級性的錯誤的觀察和加入

国民党》，乃是《国际对於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錯誤》，而不是當時他所領導的機會主义中央不執行国際正確策略的錯誤。他認為現在中国革命失敗了，《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对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讓步与帮助，……封建殘餘……失了和資產階級对立的地位，……变成殘餘勢力之殘餘》，《資產階級与封建勢力的矛盾也沒有了》，由此便得出《現在統治階級不是走向崩潰，革命鬥爭不是開始復興而是更加衰落》之取消主义的結論。於是他完全站在反对六次大會的觀点上，認定《在国際直接指導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會，不僅对於將来的革命性質仍舊犯了機會主义的錯誤，並且对於目前的革命勢形也作量不正確》，因之他周彭述之便認定《工農蘇維埃在目前祇是宣傳口号》而沒有实際意义，主張以《召集国民會議》為目前的《總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号。在策略上更攻擊中央所領導的五卅与八二在上海的示威是玩弄，是盲動，而主張應採用《合法的方式》。這表示他已經從機會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已經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墮落到資產階級左派的立場去歌頌豪紳買辦資產階級之《穩定》(?)的統治。這与脫落茨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問題的取消思想，完全是一致的。這樣極端右傾的思想，這樣反国際反党的路綫，如果在党内存在，毫無疑問地是破坏党，破坏革命，以至背叛階級帮助敵人。

並且他在行動上，更於中央未决定与答覆以前，便將他寫給中央的信，作公開宣傳，經过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等極力煽動同志起来反党，並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脫離。這很顯然是反党的小組織行動，並且是第二党的萌芽！中央在開始，是堅决地与他作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並於十月五日通过了反对党内機會主义与脫落

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可是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並拒絕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後两封信中公開地揭出他反對這之等反国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党之一貫跨歲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国際及联共党所開除的脫洛斯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對這之等已經決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変他们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尔塞維克党决不能容留這樣永不真实地承認自己錯誤並接受国際和中央决议，公開的要国際開除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佈叛変無產階級，叛変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許有這樣反国際反党的小組織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議：

一、開除陳獨秀党籍。

二、對這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執共陳獨秀一樣的錯誤意見，經过支部區委省委共之作詳細的討論和批評後，一点也不改変他们的錯誤思想，並且積極作小組織的活動，煽動同志反党，破坏支部開會。因此，中央批准江蘇省委關於開除他们四人的决议。

三、各級党部須嚴重注意機會主义——反对派的活動，如果発現了這樣小組織的存在，須根據党的最高原則，立即予以解散。对於這種小組織的頑神份子須堅决地開除出党。參加活動或接受這樣錯誤的思想同志，須有詳細的解釋和批評，糾正他们的錯誤。如果經过多次教育以後还固執他的錯誤思想共行動，便應毫不猶豫地開除出去。

布尔塞維克党能够執行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完成歷史的使命，就是因為有他的寶貴的武器——一致的精神共鐵的紀律。服從大會决议，服從指導機關的指導是

這樣破壞了黨的最高原則。如果破壞黨的決議，不同意大會的決議，不同意大會的決議，自由行動，這便是破壞黨，破壞無產階級的利益，必須對這樣的行為予以堅決的制裁，方能鞏固黨的組織，發展黨的鬥爭的力量。

"誰願意損害無產階級黨的紀律，誰就是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列寧——左派幼稚病）中央号召全黨同志一致的起來，擁護黨的鉄的紀律來鞏固無產階級的陣綫。現在黨內各種各色的調和派的思想，實際上就是阻礙黨對於取消主義的鬥爭，幫助機會主義——反對派在黨內發展，鬆懈黨內鉄的紀律。且這種調和傾向，根本便伏有右傾成分，如不徹底肅清，則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與機會主義走同一的道路。因此，中央号召全黨同志在肅清黨內取消主義的鬥爭中，同時要堅決反對各種各色的調和派的傾向。

黨的鞏固是建築在黨的統一的意志的基礎上，"肅清黨內機會主義的分子，不只是不會削弱了黨，而且是加强了黨，加强了工人運動與革命。"（列寧——虛偽的自由論）尤其在現在革命鬥爭緊張的時期，黨的機會主義——反對派的搗乱，毫無疑問的是帮助了敵人，如果不肅清這樣取消主義的思想，不開除這些機會主義——反對派的領袖分子，決不能堅强黨領導革命鬥爭的任務。中央号召全黨同志起來為黨的統一的意志而奮鬥，為共產国際共六次大會的路綫而奮鬥，肅清一切反列寧主義的機會主義與脫落斯基主義的取消派的思想與小組織，肅清一切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思想，肅清一切調和派的傾向，擁護中央的決議，擁護黨的鉄的紀律！

中央　一九二九，一一，一五日。

Прощальное слово Чен Ду-Сю.

(Из журнал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29 г. №50).

陳獨秀，咱們永別了。

（對他給中共中央的信底答覆。）

大學教授陳独秀过去是中国共產党的創始人之一。當国共產党还與国民党联合的時候，當中国工農群衆还與民族資產階級在一條革命战綫上完成"北伐"的時候，在那个階段上他曾为中国共產党的領袖。那時中国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还未被强大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革命的怪物所恐嚇，一部分渴望中国民族解放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曾經过共產党来找得实現他們的民族革命的願望，因为而且只是因为苏維埃政权和共產国际是在世界上帮助中国從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唯一的力量。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與共產党的聯合在某一个階段上必然的要把机会主义和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成份帶入共產党裏来。這在由無政府主义走向列寧主面来的陳独秀教授的作用中表示得最明顯。

當在與帝国主义及封建勢力作革命鬥爭中歷史上还能夠並且必須與国民党联合的時候，共產国际的路綫被中国共產党的領導机關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陳独秀对此要負不小的責任。當中国共產党过去與民族資產階級保守着統一的革命战綫，當時沒有堅决的堅决的和澈底的保持着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組織的独立性，沒有堅固的獲得無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权，沒有達到參加政权的各机關，而止限於從下層推動国民党，陳独秀对此要負不小的責任。當開始土地革命開始的時候中国共產党不会領導這種土地革命，擴大他的範圍，以至能夠保証建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的德謨克拉西專政的建立，陳独秀对此要負不小的責任。

當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的一年以前，當卅三月廿事变的時候，共產国际的代表和一部分中国同志提议進行反攻，以回答蒋介石的第一次叛变，陳独秀阻攔了党進行這一步。関於這一点他自己曾在中国共產党第五次大会上說：『當時我們的力量还不够去鎮压蒋介石，因此中央主張採取退守和讓步的策略……那時蒋介石还沒有公開地表明他的反革命的面目。社会的公意还不贊成鎮压他，所以我想过去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过此一年之後，當在议事日程上已經提出了領導土地革命的問題時，陳独秀不顧共產国际的訓令和許多中国同志的要求而反对這个提议。同時在中国共產党第五次大会上他在他的報告中說道：『雖然我覺得过去我們的策略在這个問題上未免走得太右了，但是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在目下絕算过於革命的方法，我們應該在相當時期中持守中間的路綫』。大家都知道，大半因為党的領導的机会主义錯誤，蒋介石才得完成他的革命的叛变，恰恰在此種叛变以前，陳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與汪精衛联名発表可恥的宣說宣言上道：『無論有些共產党員錯到何等地步，但共產党絕不想推翻国民党。這種行動就会是把他們自己送到反革命，軍閥和帝国主义者手裡……中国與其他各国不同，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因此為着革命順利的発展起見必須各階級民衆有親密的合作，……中国現在不須要無產階級專政……共產党與其他政党一樣也是希望秩序與和平。共產党是贊成国民党的政策的，並不想反对他的意思』。

陳独秀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與布蘭得列尔（Брандлер）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中的作用差不多。當他被共產国际取消他的領導以後，也像布蘭得列尔一樣並不退出党，但同時又不覺悟自己的机会主义錯誤亦放棄這些差誤。他與布蘭得列尔一樣在相

當時期中躲在暗地裡，等待新的恐慌和新的矛盾加強的時候，好再揮揚他的机会主义的旗帜。

這个時期果然到来了，奉天和南京的土匪，受着帝国主义强盜們的唆使，强奪佔了中東路，以便挑動苏联開战。

當這種緊急的時候，中国共產党的政治局，執行了自己的革命任務在群衆面前提出"保護苏維埃共和国，反对反革命的干涉"的口號，陳独秀乘時就發表進攻中国共產党的中央，連給中央三封信，在信中以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綫與中央的路綫对立。在這兩封信中，他証明說中央不應該在目下提出保護苏联和反对進攻苏联的口號，同時中央也不該在群衆面前宣傳轉變反革命干涉苏联為革命的前途。因為這樣群衆將自然地得出下面的結論来："帝国主义向苏联進攻既會有這樣的好处，那末讓他們快些進攻苏联吧"。

按陳独秀的意見，中共中央不應號召中国無產階級来保護苏联而與進攻苏联者作鬥爭，而應向群衆說如下的話：《有兩種可能性：或者苏联堅持到底，并因此帝国主义者繼而保護中国在遠東和近東進攻苏联；或者苏联讓步，并因此帝国主义者為瓜分中東路而自相紛擾，而早遲亦要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战。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中，中国都要成為軍隊所蹂躪的战場，成為世界的塞尔維亞，且使中国人民受痛苦最甚。》在這篇極妙的宣言中，沒有一句話說到强佔領中東路的性質是强盜行為，沒有一句話說到這種强佔的目的是要把苏联捲入战争的旋渦中，要打擊無產階級專政的国家，借此打擊世界革命，并因此打擊中国革命。這篇宣言的意思是很明顯的：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的衝突，不関我們的事情，各人自掃門前雪，我們衹要使中国能平安过日子，不致成為战場就好了。這篇《和平主义》的宣言之客观的目的也是很

明显的。这就是要在反对苏联的战争日渐成熟的时候，號召中国工人沐浴着战袖手旁观，不要陷入战鬥中，不要積極地起来保護苏维埃共和国。陳独秀又說，纵在帝国主义者反苏联的战争爆发时，国民党联合了帝国主义，那也不能被把說：战争《对于苏联是危險的》，這个理由来反对战争。

陳独秀說中共中央不應提出保護苏联的口號，他的動机在那裡？他的動机在於：中国的民衆不懂得这个口號，《民衆以為我們被《蠱惑》收買而不顧及民族的利益了》。陳独秀說：《按我观察，我們不能採取這種簡单的宣傳方法，而和我們兄弟党一樣；换句話說，我們不能限於把世界革命的大理論通俗化，因為不能教訓我們这樣去回那些群衆所急欲知道而須要回答的实际問題……目前中国人民的廣大群衆都為具体的民族利益所吸引了。我們應向民衆明白地解釋這種情形，我們應開導他們权衡实际的利害。我們應告訴他們：欲以自己的力量收回中東路而為我們完整的所有物，在目前是徒勞無益的幻想，而祇有在這時候，他們纔能覺到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不同。祇有在這時候，他們纔能了解苏联是反帝運動的中心，是一切被压迫民衆的統一战線上的領袖》。

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存在已有十二年的時候，在1917年之偉大的中国革命後，在中国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者的一切变敎之後，在中国無產階級和農民群衆經过一切困难道路之後，陳独秀教授向中国共產党建議，叫他開始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的火爐邊跳舞，做他自己在沒有成為共產党員的時候所做的那種勾當，做他实际上永遠繼續着的那種勾當。陳独秀向中国共產党建議，開始要保護中国《全民族》的利益，然後小心地慢慢地使群衆覺悟到那个对他們仿佛是《新的》和《危險的》思想：苏联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統一战線上的領袖

和反帝運動的中心。可是，即使等到民衆最後覺悟起来的時候，陳独秀却还不肯把最後的話——《保護苏联》——告訴他們。在他的第二封信中，他祇同意於可对中央政治局作如下的讓步：《站在帝国主义者進攻苏联的观点上来观察中東路的强佔，我們應該說這是階級的衝突。這个論断是無須再加解釋的(!!)》。至於說，苏联是反帝運動的中心，則必須向中国民衆（大概是十二年来在桃花源洞裡过生活的）以暗示的方法小心地慢々地解釋，使他們不致懼走。但是决不須向他們說起：中国的民衆起来保護苏联，因为這是《連無須再加解釋的。》ㄋ！

於是祇要中国共產党听從陳独秀之明聽（而卑下的）建議，保持《懷疑》的政策，国民党便可毫無障碍地在群衆間煽動，說苏联進行《赤色帝国主义》的政策，說牠是中国《民族统一》的敵人，說牠是軟弱無能的，孱趕快結美英法各帝国主义的帮助給牠一个打擊。然後，便能使牠讓步，并從此完成他子子的功劳而得到報酬。然後，中国便能以出賣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代價，出賣中国革命的代價，《用自己的力量收回一半路而成为完整的所有物》，以替中国小資產階級之私有財產者，資產階級的資国主义者，的利益爭得光荣，陳独秀便是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

陳独秀是1927年革命期間中国共產党的積極工作者，當時帮助這革命而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祇有苏联，他現在好不勇敢竟拿如下的話来慢罵中共目前的領導：《看保我們懷疑的策略是放在廣大群衆容易認識苏联是中国解放運動的良友這个推想之上的，這就是証明你們的盲動主义的心理，并証明你們不能分别主观和客观的不同》。更露骨地誹謗中国無產階級是不會再有的了；中国無產階級已在数年来的革命过程中不

僅在自害的意义上且在政治觉悟的意义上得到空前的长进，能否骂他们毫无记忆力！数十万的中国无产者会唾骂满肚经典的陈独秀教授的这种诽谤，视之为瞎狗的狂吠。

大　大

大

当中共政治局把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这种虚伪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立场揭发以后，陈独秀在他第二封致中央的信中，又想把问题《加深》，並给自己的立场以"理論上"的根拠。同时他便提出了两个提纲，这两提纲对於那种还"大胆"把自己叫作共产党员的人，是非常有趣的。

他在第一个提纲說道：《所謂"原則"是經常不变的；至於說到政策與策略，那末就不能在任何時候，關於任何問題，都机械地根拠原則来採用，這裏必須估量到時間與空間的条件。在有些時候，時間與空間都要求根拠曲綫来執行革命的任務，因此，有時必須採用一種與原則分岐的策畧。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點，那我們就会要骂列寧在布納司特和約問題中的策畧了》。

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在這裏以"辯証學家"的資格，来向我們說話。他說：《大家把列寧叫作"政治的辯証學家"，並不是徒然的；列寧知道为甚么他要譴责那些反对布納司特和約的同志"。不錯，列寧是知道为甚么他必須譴责那些反对布納司特条約的同志；但新出世的辯証學家——陳独秀是不知道這一點的，他現在不知道，將来也不会知道；因为机会主义者永遠都是不能了解這一點的，在某種条件之下，列寧並不反对妥協，在某種条件之下，列寧認为必須退守（以便退守以後，再迅速前進，很好地跳躍过去）。但列寧從来沒有"在任何地方，《在有些時候，必須採用一種與原則分岐的策畧"。

列寧從来沒有，在任何地方說甚么，在相當条件之下，『我們的策畧必須離開我們的原則』。列寧說：『有兩種不同的妥協』。『每一个無產者，因為他自己所处的群衆鬥爭和階級矛盾執極端劇烈的環境，是能夠看得出兩種妥協的差別的，第一種妥協是被客觀環境（如罷工者因為基金用完了，又沒有外力的帮助，以致饑餓交迫不能支持）所强迫而進行的妥協；是一種絲毫沒有減弱革命忠实性而備使這些暫時妥協的工人更進一步舉行鬥爭的妥協。至於第二種妥協，則是叛徒底妥協，這些叛徒把自己的欺騙（工賊們也進行『妥協』呢！），自己的怯懦！自己想為資產階級服役的願望，自己的最怯投降，當作客觀的原因……』（見『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十七卷156頁）。陳独秀要求共產党進行第二種妥協；他要求共產党在他人進攻苏联時，袖手旁觀，這在实际上就是帮助反革命的国民党，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地位。换句話說，他要求共產党来表演『工賊』的作用。他要求共產党販賣无產階級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事業，他把『自己的欺騙』，自己想為中国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和愛国主义『服役的願望』一，『當作客觀的原因』。

至於列寧在布納司特和約中主張的，則是第一種妥協。他底出發點，是認為俄国兵士群衆，『困苦已達于極點』，不能繼續打仗了，所以他提議和德国的强盜進行『妥協』，『以便減少强盜所帶来的禍害，以促成拿捕和擒救强盜的工作』（註一）；以便從這些强盜手中得到一點休息，以救濟苏維埃政权；以便不落入那个陷阱。而資產階級及其走狗正是自覺地把布尔塞維克向这个陷阱中推去他們鼓動布尔塞維克繼續使我們必遭失敗的战爭了。（註二）。因此，列寧在布納司特和約中的策略，並沒有『離開我們的原則』；而正是相反，這个策略底目的，首先就是保証我們的原則之勝利——救濟

苏维埃政权，鼓吹共产主义的学说。

陈独秀在第二个提纲说道：《我们应当批评国民党的《误国政策》。我们应当根本：《在目前的中国多数民众，都被具体的民族利益所陶醉了》。《他们（中央底同情者）以为在无产阶级字典中不应有"民族""国家"一类的字样，如果谁使用了这种名词，谁就，"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传染了资产阶级底思想。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攻击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的原因，是因为战争使国家破产及破坏了俄国资本主义(??)，并把俄国入非常被动的状态。如果我们不了解列宁策略是按照时间地点而应用，……那我们就不能了解列宁就会骂列宁，说他拥护了民族主义者与资本主义拥护者底口号，说他接受了民族主义者与资本主义拥护者底思想了》。

在这里，陈独秀又来无耻地造谣和污蔑列宁了。列宁曾经极端坚决地为了激发完成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而斗争过，列宁曾经极坚决地执行了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过程中领导其他阶级的原则。可是，列宁在当时的最高原则，绝对不是在俄建立"自由的民族"，或消灭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列宁并没曾关念到祖国的资本主义命运；他所关念到的，就是共产主义底前途。列宁在一八九四年，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甚么是人民之友》——中，就已经写道：因此，在联合急进的民主派以及对专制制度及反动的等级和机关作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底直接责任——社会民主党必须时刻使工人阶级注意这个责任——就是要了解这种斗争——反对这些制度的斗争，其所以必需，只是（马尔丁诺夫加 畫）因为他是促进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要了解工人阶级所以需要实现一般的民主要求，只是要打通一个大道——以便达到战胜劳动群众底主要敌人——资本——（马尔

丁諾夫加盡）》。（註一）。经过十一年以後（在一九〇五年）又写道："我們不半途停止……我們要竭力帮助全体農民完成民权革命，以使使我們——無產階級政党，能夠更加容易盡量迅速地轉入新的最高的任務——社会主义革命"（註二）。又经过十六年以後（在一九二一年）列寧又写道："考茨基，希法亭，馬尔託夫，……不能夠了解……資產階級民权革命與無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相互関係。不了解第一个革命怎樣轉变为第二个革命》（註三）。

注一見"甚么是人民之友"，16号頁

注二見社会民主党对農民運動的態度 列寧全集第七卷449—450頁

注三見十月革命四週紀念全集十八卷第一册第365——366頁。

机会主义者陳独秀把列寧與資產階級自由派斯特魯維混为一談了（這对于他是適當的）。斯特魯維確然断定了，为着資本主义在俄發展起見，俄罗斯應有政治的自由……。按列寧的意見，俄罗斯應有政治的自由，因为他是为了各方面去發展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为社会主义为共產主义革命而奮鬥之必要的條件。按列寧的意見，資產階級性的德謨克拉西革命應當轉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時代中之馬克思主义者沒有一个人像列寧這樣注意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但是這些問題对于列寧不是有自足自滿的意义的，不过這些問題对于他——（对于馬克思亦然）所以有衛大的意义，实因为這些問題與国际無產階級革命之發展和勝利有密切関係。列寧引証过1869年十二月十日馬克思底信；在該信中馬克思說出，他在第一国际委員会中関于愛尔蘭問題底報告是要如何結構：《……不管一切関于

《以公平对待爱尔兰》之《国际的》和《慈爱的》说話，（這在国际委員会中，是不言而喻的）而英国工人階級底直接的，絶对的利益使他要脱离現在与爱尔蘭的関係……。我想了許久以为用英国工人階級之高漲可以顚覆爱尔蘭的統治……。更深刻的去研究問題使我相信適得其反。当英国工人階級没有把爱尔蘭解放出来的時候，他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在英国的英吉利之反動勢力是建築在压迫爱尔蘭之上的》。

为着馬克思這一段話列寧写道：《从民族運動中馬克思有得出什么絶对的東西（我加上的画線——A.M），因为只有工人階級底勝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以完全解放。要預先擬定在被压迫民族之資産階級的解放運動和压迫民族中之無産階級的解放運動之間……一切可能的相互関係，是不可能的事情》。列寧（和馬克思一樣）对于民族解放運動有莫大的注意；可是此種運動对于列寧不是《什么絶对的東西》。在他看来，把各民族解放運動联絡起来才是重要的，此外他把這種運動底利益始終服從無産階級革命底利益。在他看来，民族革命運動所以重要是因牠使群衆——首先是農民群衆，革命化起来。列寧对于民族自决权底問題恰巧是抱这樣的態度的。他对于这个問題的原則上的態度可從他的下列的話中看出来：《工人階級底利益和他的反对資本主义之鬥爭底利益必須有要各民族的工人們完全一致的行動和最密切的團結，必須抵抗任何民族的資産階級底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若起来否認自决权（即被压迫民族之分立权），或者社会民主党人实行擁護被压迫民族底資産階級一切的民族的要求時，那末這都是离開無産階級政策之任務，這都是把無産階級的政策服從資産階級的政策罷了》。

我們看見，在無産階級的革命者列寧和 民族改良

主义者陳独秀之間有一个小々的差别：列寧把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服從無產階級革命底利益，反之，陳独秀把無產階級底利益去服從資產階級《民族》底利益，并且恰々因為他的這个《愛国　主义》他現在把中国人民底利益去賣給帝国主义者。

*　　*

*

自從陳獨秀前二封關于中東路事件底信被中共政治局堅決的責斥以後，陳獨秀很聰明地再不談這個問題了。由是陳獨秀在他的第三封信內在各方面進而實行向中共中央作總攻擊。此次他的行動已經是更狡猾了。此次他用《左的》托洛斯基主義的詞句來掩蔽他自己的深刻的機會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取消派的投降的態度。這一封信似乎是在托洛斯基吩咐之下寫成的：一丘之貉心心相應……。他這封信開始便這樣寫道：《我們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之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全党底機會主義的策略，這是那些不了解革命底性質、資產階級对革命的關係和從此所發生的危險性，尤其是不知道国民党之階級性底同志要負責任的。這種不正確的估計我們一部份同志他們自己是沒有看到的，這就減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加强了資產階級底武力並且又是革命失敗和資產階級勝利之先決條件。如果我們不把這個事實有明確的估計，那末我們便陷于坭坑不能自救。我们在口頭上反對機會主義》而實際所做的事情一切還是各種形式之《機會主義》。

陳獨秀為着用《左的》托洛斯基主義之詞句来掩蔽自己的投降態度，他利用中共中央所做了的和共產際国所改正了的一個錯誤以攻擊中共中央。

在中共中央第十三號通告中說：《主要的戰爭的危險是由於資產階級和地主，買辦间的根本的矛盾所引起的。對資產階級的經濟的發展很重要的是，擴大国内市場和縮小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成份。因此資產階級願意給封建勢力以相當的打擊，改良農民的地位，排擠帝國主義列强和实行関税自主（最後兩点是資產階級發展的一定不易的先決條件）。地主階級極力加緊農民的剝削，而買辦則極力求帝國主義商業的發展。這些利益是不可調和的。》

陳獨秀大發雷霆反对這個真正錯誤時；充滿了机會主義的結論中央的通告中的提綱，并極力想造成這樣的感想，好像他提出了革命的提綱以與這個機會主義的提綱對立。陳獨秀寫道：《你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覺悟到資產階級態度的變更对於革命的危險。你們一直到現在還不明白國民党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只有俄國的孟雪維克……認為，立憲民主党比封建的君主派進步些所以當他們彼此之間假如果發生衝突時，那末無產階級應當附和資產階級，以便帮助她消滅封建派。主憲民主派聲言道，既然她是在和封建主作爭鬥，無產階級不應當起来反對她，而孟雪維克也就同意與此，同時波尔雪維克則堅決地反對這個要求。反桂系的戰爭——這就是反封建的戰爭；——蔣介石也正是這樣的宣傳，不幸我們党的中央所說的也竟是同樣的》。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共產國际執行委員會推翻了中央第三十號通告中所提出的提綱，陳獨秀一下子抓着這個不放手如像溺水的人見了救命圈一樣。以後我們要解釋中央通告中的提綱的機會主義性在什麼地方。但是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中共中央的一般的路線中那些是正確的。這些正確的是：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絲毫沒有勝利，因為在中國甚至於用《普魯士》式方法消滅封建也沒有實現，因為當中国一天还在帝國主義压制之下的時候，消滅封建簡直是不可能，所以在中國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利益的矛盾也沒有消滅，雖然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完全反革命了。這無條件地是反對的，不管現在的托洛斯基主義者陳獨秀主義者和一九二七年俄國托洛斯基反對派如何地說法。在中国目前這個階段上兩個階級間的相互關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廿六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曾這樣具體的說出：

《一九二七年底當着鎮壓和摧殘工農運動起見，形

成帝国主义地主及全部資產階級的統一的反革命的联盟，這一联盟，繼續的存在於地主資產階級反動勝利的初期，現在，這一联盟之中的内部矛盾和分裂，却在生長着且深入。虽然一切剝削階級一般的都是反革命性的，虽然他們這些階級，对於中国国内的矛盾主要以及中国與帝国主义的矛盾的立場，相互之間的分别很不清楚，——然而，現在這个联盟始終分裂成為兩个主要的政治派别。

第一派包含軍閥，封建地主，和土著的大資產階級（極大分数是買办界和銀行界的資產階級，當然不是純粹只有買办和銀行界）。這一派的政治上的代表，現在是執政的国民党和非国民党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各種小派别……

第二派企圖在政治上形成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間，代表中国民族資產階級的中间，就是代表工業資本家的一部分，和商業界的一部分。這一派，对於現在執政的国民党，處於在野党的地位，而散佈自己的影响到中小資本的企業家，到不滿意的小地主，以及城市和鄉村的上層（剝削者的）小資產階級。這一派的政治上的代表，是"国民党改组派"（汪精衛，陳公博等……）這一派以及她的代表，"国民党改组派"是反革命的，極深切地仇視工農革命運動，仇視蘇联，对於帝国主义和軍閥制度，是極端的妥協和馴服的。》……

在中国反革命的联盟中，存在着這兩個階級的派别，有什麼意义，以及对於中国共產党由此產生一些什么任務呢？這兩個階級的派别的存在，第一，反映出在中国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还沒有完結，以及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的事实。第二，這兩個派别間鬥爭的劇烈化，証明在中国目前開始了革命運動的新的高潮，和南京政府的危機。在極端尖銳的革命的時候，當土地

革命開始的時候，整個的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各種派別都混合成為一個反動的集團。然而當發現了南京政府在革命失敗之後更於一個擊敗的地位，而且當新的高潮已經開始的時候，南京這個聯盟便分裂了。由此可以作出什麼結論呢？第一，自然說不上什麼幫助資產階級民族改良派反對南京封建資產階級派；他們兩派都是反革命的，同時民族改良主義者還更危險，因為她會利用社會的煽動。第二，為工農革命運動發展的利益，必須利用這兩派的分裂以及反革命聯盟內的混戰。

這樣，我們看到中共中央同意於共產國際而指出中國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利益上有某種矛盾的存在，這是完全對的。可是我們從中央通告第三十号上所摘錄的提綱，是機會主義的，是不對的。這個通告中有這樣的一種說法，似乎"資產階級願意改善農民的地位"，還有一種說法，似乎說"調和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利益在中國是不可能的"，這二種說法都是機會主義的。在中國資產階級投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以後，資產階級同封建階級的利益底調和到某一個時候是必不可免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上面引過的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信中有一段說是完全正確的，這一段說是論到那目前對於南京政府取反對態度的第二個集團的。

『在獨立的工農運動將來的革命高潮的條件之下，他們很快的就要喪失他們對於現在政權的在野党的態度，而在無產階級農民起來實行一二次的堅決的階級戰鬥的時候，他們就要很快的和那第一派合併，成為統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

中央通告的綱領中的第二個錯誤，是在牠沒有估計到現在兩方面和南京政府的社會基礎已經不是和一九二七年以前的一樣了。中央沒有估計到現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已經不是反革命的南京政府，而是反革命的汪精

衛派了。而南京政府現在所代表的是軍閥，封建地主，本国的大資產階級——大半是買辦和銀行資產階級。

中共中央在他的通告中有一種虛妄的提綱，使陳獨秀有所憑藉。但是我们必須指出来說，中国共產党的中央第一，沒有堅持這種錯誤，第二，沒有從這個提綱中做出在邏輯上會產生出来的那些機會主义的实際的結論来。就在发展這個提綱的那個第三十号的通告中，中共中央已經確实的指出"資產階級企圖以欺騙的改良主义的政策来奪取群衆而使群衆在他的影响的支配之下"和"所以，在現在這個時候，改良主义的幻想是一個嚴重的危險"又說"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的宣傳要比地主和買辦階級的改良主义的欺騙更為危險"。

這樣看来，中国共產党雖然提出了一個虛妄的提綱，却並沒有一点实主張幫助，現在中国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反封建鬥爭。恰正相反，中央在第三十四号的通告上却十分肯定地說：

"照一部分同志的意見說来，蔣介石和廣西派的戰爭是資產階級反对買辦和地主的戰爭，就是說這是民主勢力反对封建勢力的戰爭，是帶有反帝国主义性質的，因此，他在客观上是有革命意义的。這個观点是右傾之極端的表現而在实際上則幫助了蔣介石。"從這幾句說話中毫無疑义的可以看出他把陳獨秀污衊中共中央執行了機會主义的政策，中央却用最堅决的態度来反对這政策，反对這個政策為"右傾之極端的表現"。

陳獨秀本人用什麼東西来共中共中央的政策相对抗呢？他用什麼名义来用左的假面具以進攻中央呢？他是用二個托洛斯基的取消派的論点来对抗中央的。第一個論点是說中国資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勝利了。他寫道：

"你们到現在还沒有明瞭革命的失敗和資產階級的勝利"。以下他又說："資產階級已得到了勝利，他在其他的

階級中作有了領導的政治地位，從帝国主义方面獲得了許多讓步，獲得了帝国主义者的幫助因而增加自己的階級的比重力量。在這個時期中，封建階級為要避免完全失去在中国的政權計，自己就必須力圖在城市的商業和工業中抓取经济的權力来作為每一地域的統治基礎”。

陳獨秀不但跟着托洛茨基主义者確定的說，中国資產階級獲得了勝利”而已；他同時又完全同意於一九二七年俄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說法，肯定的說在中国封建制度是没有什麼作用的：“你们抹煞了這些十分明顯的事实，至今还是繼續过分的估計封建勢力”。他所用来証实他自己的意見的那些說詞，恰巧就是一九二七年我们從托洛茨基反对派那裡所聽到过的那種論調：“实際上中国的封建勢力很久就已經同商業資本緊々地相融合起来了。在世界帝国主义打進中国和資本主义侵入農村之後，中国農村的全部经济組織就在商品经济的徽号之下開始発展起来了。”學問高深的陳獨秀教授，像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先輩一樣，都不知道最膚淺的一個歷史的真理：處於工業資本主义時代以前的封建制度這個階段，他的特点恰正是農村中的商品經济的発展和商業資本的佔優勢。

末了，陳獨秀还是完全同意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意見，在進攻富農及進攻对富農还把有希望的機會主义者的掩飾之下，否認中農在土地革命中的作用。实際上這是等於否認農民土地革命的可能。他說：“現在只有鄉村的貧農……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中農是不堅定的分子（這是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革命中！——馬尔提諾夫註），而農民中富裕的上層分子完全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因為土地革命的結果，他们應該对農民的革命階層作更多的讓步，而土地的剝削下所失掉的反要少些。因此，誰要以為富農在革命中從頭到尾都是跟着我们跑的

這正與那說要與資產階級联合以完成反帝国主义的鬥爭，一樣的是機會主义。

在中国農村中佔優勢的不是大地主的地產，而是小地主的地產，富農在鄉村中同小地主，一樣的是採用封建式的剝削方法，所以富農在土地革命中，已经是，而且將来还要更有力的盡其反革命的作用。這是完全正確的，共產国際在自己的一封信中，早已解釋过了。陳獨秀要来說明這一点，直是白費氣力。陳獨秀這種对於希望富農的機會主义者的攻擊，僅々是面一屏風，用来遮蓋他自己機會主义的托洛茨基的論斷，認為在中国的土地革命中，連中農也不能討赤進去；為了造成他的取消派政綱，這一個論斷，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勇敢的說出他的論斷，而否認這些最明顯的事实：否認目前在中国大多数省分中，群衆的土地運動的高漲，否認《紅槍會》的運動，否認在中国南方沒有停止的遊擊戰爭，否認最近来中国蘇維埃區域的擴大等。

陳獨秀究竟為了什麼必需這些托洛茨基的經濟理論呢？是為了深刻的实際的目的；為的是要求証明中国革命已經完結了，已經可以建築紀念碑了。陳獨秀完全与蘇維克取消派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敗以後一樣，認為現在（还是与托洛茨基一樣）中国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已經革命了，因此，在中国當还沒有造成社會主义革命的條件時，在很長久的時間是不會有革命高潮的。

由這托洛斯基的取消派的觀点出发，陳獨秀又作了自己的第二個結論，認為中国共產党為了要自衛起見，不談拒絕革命工作應該公開的去適應資產階級的統治，不應該說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托洛斯基說廣州暴動是在革命高潮低落時的盲動，陳獨秀也与他一樣，認為共目前革命工作的一切企圖，都是《減亡的》，

《盲動的》政策。陳独秀說：《中央無論如何想證明，新的革命潮流的高漲是最近的將來的事，因此，盲動主义的政策依舊的存在着》。他又說：《很明顯的，中國革命新的高潮是可能的，然而，說到時間的問題，什麼時候到來，這是誰也不能預言的。能夠看見的，只是革命高潮不會在很快的時候到來。过去的革命高潮早已完結，新的高潮尚未到來，而且沒有任何的象徵可以預言他在最近的將來必要到來。----你们誇大了群众鬥爭的程度。在六次大会以後，你们沒有公開的說，革命高潮還是继續着，但是你们說，革命的高潮接近了，革命又要重新的恢復起來。你们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鬥爭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更加銳利起來，目前的階段是世界革命發展的緊急關頭》等々。

在一九二七年革命中完全破產了的陳独秀教授，簡直是驚弓之鳥，連革命這個字，革命的幻想，甚至於說革命的新高潮接近了也害怕起來。在中央不允許他散佈其取消派的投降的观点時，則高叫其压制自由批評，中央的《官僚主义集中制》，認為《在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情形下，一切瞞詐，欺騙，獻媚上司，個人主义，失望等々，都成了必然的現象》。中国共產党内被產了的機會主义領袖，同酒瘋子一樣，以為滿街都是酒醉漢，在結尾時說《我不能不可惜，建築無量数的同志的血和骨上的党，因為不正確的路線的，結果，使党進入了消沉的狀況，而破坏了我們所獲得的一切。我希望你们——就是暫時的也好——拋棄你们狹隘的观点，而很注意的，很有忍耐的来認識我的意見。》

鼠目寸光的《切实的》陳独秀教授，他誣衊中国共產党的中央是《主观主义》《幻想》《空想》，然而生活指出了——誰清楚的看到了，誰完全瞎了眼睛。陳独秀所寫的叛徒的信上的墨迹未乾，而生活却是已毀滅了

他一切的指望。

陳獨秀在他的第一封信裡，論中東路事件，提出這樣的兩個可能——或者蘇联自始至終堅持其强硬態度，這時帝國主義者便向蘇聯進攻，或者蘇联讓步，這時帝国主義者中間為瓜分中東路而互鬥，爆發世界大戰。事實上暫時兩者都不曾發生，發生的都是第三個：蘇联堅持了强硬的政策，結果奉天與南京與帝國主義者都相繼的暫時讓步了。這樣陳獨秀一定要大洒其"愛國的"熱淚，陳獨秀說資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統一了政權，但是实際上我們看到南京政府整個的崩潰。陳獨秀寫過在中國看不到革命高潮的象徵，但是這些象徵却是與日俱增。

陳獨秀完結他的政治上的遊歷。他的政治遊歷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起始。因為中國的解放與無產階級革命是緊密的連繫着，因為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勝利則中國不能得到解放，所以陳獨秀的民族主義他便走進共產党的營壘中来。但是他雖然為公開的共產党員，而在其下意識上却仍然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者，這表現在他整個共產主義的活動中的機會主義與妥協上。在他的心坎裡有兩個灵魂。這種情形只能繼續到某個時期，到某個嚴重的場合為止。當在中國兩面都立着階級及對階級的戰壕，當南京奉天的强盜强奪了中東路，當中国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帝國主義與蘇維埃共和國直接戰爭的前途完全表露出来了的時候，當着他應該選擇——或者同革命的無產階級一塊站在蘇維埃共和國的方面或者同資產階級的"民族"一塊站在帝國主義的方面的時候，他市儈式的私有者的愛國主義的灵魂就選擇了帝國主義的營壘，陳獨秀如一敗家浪子已經回到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家庭中了。然而他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夢迷的革命者，而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者與叛徒。中國的無產階級对於這個早就纏着他們的脚跟

的叛徒是毫不辜惜的。他们更坚固的团结自己的隊伍，更高舉起為革命先烈的熱血所薰染了旗幟。成千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者来代替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叛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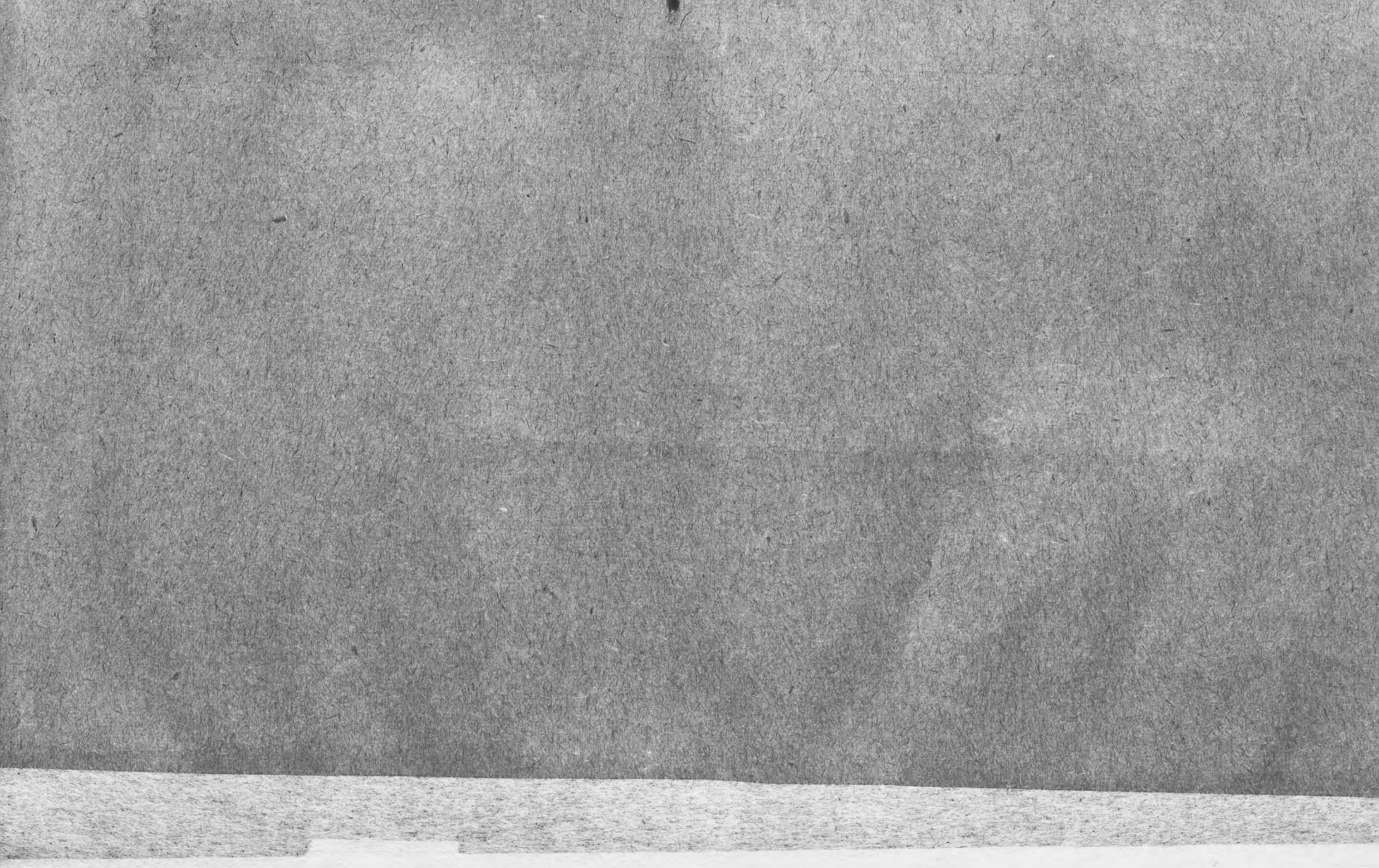
補誌：此文作完後，我們接到中國共產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開除陳獨秀的決議。這個決議对於我們在本文中所寫的陳獨秀的繪像，補充了許多实际的地方，我们從決議中知道陳獨秀跟着托洛斯基重覆着說，要取消《打倒国民党》與《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以《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代替之。陳獨秀跟着托洛斯基主義者攻擊五卅與八一的示威遊行，叫這些遊行為戲弄與盲動。我們從這個決議中知道陳獨秀同時也如那時的托洛斯基主義反对派一般的修改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革命中的舊的策略：《他（陳獨秀）——的決議寫道——認為中國大革命時期中所作的過去的机會主義的錯誤，在於对國民党的階級性的不正確的觀念與中国共產党之加入國民黨，因此這些錯誤"是共產國際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策略上的錯誤"完全不是他所領導的中央的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當時中央不曾執行，不曾实行共產國際的正確的策略》。我們現在看到一九二七年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反对派的代表者在中國問題上反对共產國際的"左"的高喊的攻擊，值得什麼？！這些攻擊是投降的隱身物，是托洛斯基和陳獨秀成為叛徒的先兆。這更一次的說的在"左"的假面具掩蓋之下的機會主義與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是如何親密的連接着，這一個轉到另一個是如何的容易。

馬爾諾夫

校者注：因時間忽促，所以此地所引用的中央通告，陳獨秀的信等，都是從俄文重翻的，沒有来及按原文校正。

Стеклография КУТК. Москва. Волхонка 16.

Мосгублит 60140 КУТК. 6454. т. 800 экз. 1930 г.



13156